

内部资料
注意保存

第 7 期（总第 415 期）

2024 年 7 月 5 日

-
- ◆ 生态文明浅谈之一——忧患迫在眉睫任继周（1）
 - ◆ 大食物观视角下中国渔业高质量发展.....杨正勇 张 迪（3）
 - ◆ 不应把县城设计成农民去城回乡的必由之路.....刘守英（13）
 - ◆ 资源性质如何影响村级治理.....贺雪峰（15）
 - ◆ 农村改革中的华国锋.....赵树凯（25）
 - ◆ 基层的“痛苦”：监督越紧，违规越多.....田先红（29）
 - ◆ 量子纠缠与老年养生.....辛秋水（32）
 - ◆ 充分开发利用盐碱地.....张蓝水（34）
 - ◆ 专家对 5 本书稿的反馈意见.....《通讯》编辑部（38）
 - ◆ 当年轻人决定去种地.....颜 旭 祁倩倩（41）

生态文明浅谈之一——忧患迫在眉睫

任继周

生态文明刚刚开始，怎么就忧患迫在眉睫？因为人类文明享受近万年成果，但同时也积累了巨量的孽果，全球危机四伏。污染、贫富两极化，最逼人的是此起彼伏的遍地烽烟。面临自我毁灭。人类同声疾呼回归自然，奔赴生态文明时代。

任何时代性文明都是特定生产劳动方式与与社会秩序相结合的产物，如农业文明，是小规模自然动力与小农经济相结合；工商文明，是大规模石化动力与商业文明相结合。至于生态文明，还在我们的理想幻觉中，恍兮惚兮，幻觉在公平、正义平台上，焕发宝石样的光辉，但还未见真容。

历史唯物论的公理揭示，人类社会诞生之始，就存在两股势力。一方是摆脱私欲，以公平、正义为底线，制定游戏规则（甲方），相伴而来是它的对立面，是以私欲为灵魂的丛林法则（乙方）。甲方为人类制定社会的游戏规则，并不断完善，建立秩序。乙方作为搅局者，破坏游戏规则，肆行反公平、正义的丛林法则。两者在纠缠撕打中，最终以前者为主力构建了人类游戏规则，建立了人类文明社会秩序。

社会秩序，就是社会的游戏规则。人类近万年的文明发展中留下的山积孽果，因为迷失自然之法，几乎堵死了文明发展的道路。人类为摆脱这一困境，选择了回归自然的路径——生态文明。这已凝聚为当今的通识。

在这里，游戏规则是必要的。德国思想家席勒说，动物也有游戏，但没有游戏规则，只有人类有游戏规则。从这个意义上说，游戏规则的有或无，是人与兽的分水岭。游戏规则开辟道路，使人类步入生态文明，道阻且长，绝非易事。人类发展到生态文明阶段，汲取氏族文明、农业文明和工商文明的精华，获得智能化的新动力源，生机勃勃，走向生态文明。

而乙方挟持各个历史时期丛林法则，如影随形跟踪而至，与甲方反向纠缠，经历曲折而漫长的斗争。到一定时期，乙方必然日渐式微而被碾压淘汰。

有先例可鉴，农业文明由王道占优势的诗经时代，转为霸道占优势的皇权时代，经过了春秋时代的建构期约 294 年和战国时代的建构期约 254 年，用了近 5 个世纪。欧洲的工商文明始于文艺复兴，历时也达 200 多年（14-16 世纪）。

得益于历史的机遇，美国获得牵头人类游戏规则的动力优势，智能化的精英齐聚美国。但美国也是历史遗留的最强大搅局者。挟其杀人不闻声的金融资本，质量庞大的军火系统，以及笼罩全球的上百个军事基地，构成了丛林法则的天罗地网。甲乙双方先在国内纠缠撕打，有所不足，更打破国界奔突外溢，搞得全球不安。

举目所及，远的不说，几十年来，战火延烧了中东和北非，更延烧到工商文明的源头——欧洲大陆的乌克兰。富时代性敏感，社会精英汇聚美国大学，校园内部已经冒烟起火。就是这个禀赋生态文明的

动力优势和丛林法则的美国，出现了大分裂的预兆，新的战国时期已经开始。

历史的规律，人类前进的势头不可逆转。我们不是社会学、未来学者，不敢预言生态文明何时取得决定性胜利。只能根据公平、正义的伦理学原则，给出一句谚语：冬天到了，春天还会远吗？

（作者：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草业科学奠基人。来源：草人说话，2024年6月11日）

大食物观视角下中国渔业高质量发展

——现状、问题及提升对策

杨正勇 张 迪

一、引言

“大食物观”是党中央粮食安全观念的战略性转变和历史性演进的体现，拓展了传统的粮食边界，推动传统粮食安全向食物安全转变，不仅应关注数量安全而且应关注质量安全。从更广度把握粮食安全，已成为我国粮食安全战略之时代要求。大食物观下，“吃得营养、吃出健康”的膳食需求，高效率的资源配置及绿色可持续的生态文明建设，都对居民食物安全和渔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提出更高层面的挑战和要求。在大食物观视角下，如何实现中国渔业的高质量发展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为了厘清大食物观下我国渔业高质量发展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本文基于大食物观的内涵，概括了大食物观下渔业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从渔业高质量发展要求的“三高”之理论出发梳理了产业发展现状，归纳了渔业高质量发展存在的诸多现实问题，从坚持科技创新、加强政策引领、促进产业升级、深化科学研究等方面探索了中国渔业高质量发展的前沿路径，以期为践行大食物观下中国渔业高质量发展的目标提供科学支撑。

二、大食物观视角下渔业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和要求

本文基于大食物观强调的食物质量安全，对照高质量发展供给体系“三高”的核心内涵，将大食物观下的渔业高质量发展定义为：按照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之要求，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指向，以高效率、高效益生产方式为全社会持续而公平地提供高质量水产品和服务的渔业发展。从供给角度看，这种高质量发展内在地要求“三高”，即渔业供给体系质量高、渔业供给体系效率高、渔业供给体系稳定性高。

高质量发展要求要树立质量第一意识，渔业高质量发展首先要求渔业供给体系质量高。渔业供给体系质量高，要求渔业经济再生过程中要素投入、中间品投入和最终产出三个环节的质量都要高。要素投入质量高是指渔业劳动力、渔船、水域空间资源、生态环境系统、技术、以及数据要素的质量高；中间品投入质量高是指生产过程中的中间产品（如鱼种、饵料、病害防控药物等）能够很好地满足生产需要；最终产出质量高就是要能够提供高质量的水产品和渔业服务，是渔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内涵。

高质量发展强调要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渔业高质量发展其次要求渔业供给体系效率高。渔业供给体系效率高，应当体现在渔业经济再生产过程的技术效率高和经济效益好的有机统一。不仅表现为各类生产要素投入产出效率高，如单位捕捞努力产量、单位水产养殖面积产量（产值）、人力资源效率（产值）、单位渔业劳动力产量（产值）等达到高水平，还要求所用资源在不同用途之间合理配置，使各类要素边

际生产率和边际报酬达到最高，渔业再生产各环节中的经济主体均获得较好收益，以及渔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份额大。

高质量发展意味着效率与福利的动态平衡，渔业高质量发展同样要求渔业供给体系稳定性高。食物生产对气候、生态、资源、环境的影响是巨大的，而鱼类和渔业产品的生产则可以改善这些影响。渔业供给体系的稳定性高，应当体现在渔业经济运行平稳、渔业重大风险可控、渔业资源环境可承载、渔业发展成果包容共享。

三、大食物系统构建中我国渔业发展的现状

渔业是大食物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粮食安全的重要压舱石之一。水产品营养丰富，对许多国家人民的营养需求和经济发展都至关重要。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2年我国粮食产量68,652.77万吨。其中，稻谷产量20,849.48万吨；小麦产量13,772.34万吨；玉米产量27,720.30万吨；大豆产量2028万吨。猪牛羊禽肉产量9227万吨。其中，猪肉产量5541.43万吨；牛肉产量718.26万吨；羊肉产量524.53万吨；禽肉产量2443万吨。禽蛋产量3456.38万吨；牛奶产量3931.63万吨。《2023中国渔业统计年鉴》数据显示，2022年水产品产量6865.91万吨。其中，养殖水产品产量5565.46万吨；捕捞水产品产量1067.47万吨。水产品产量超过了猪肉、牛肉与羊肉之总和，渔业为国人提供了三分之一以上的动物蛋白。2002年至今，我国猪牛羊肉与水产品产量变动趋势详见图1。明显可以看出，畜产品和水产品的产量逐年增加，且从2019年开始水产品产量（6480.36万吨）超过猪牛羊肉合计产量（5410.11万吨），2022年水产品产量（6865.91万吨）比2002年（4565.18万吨）增长了50.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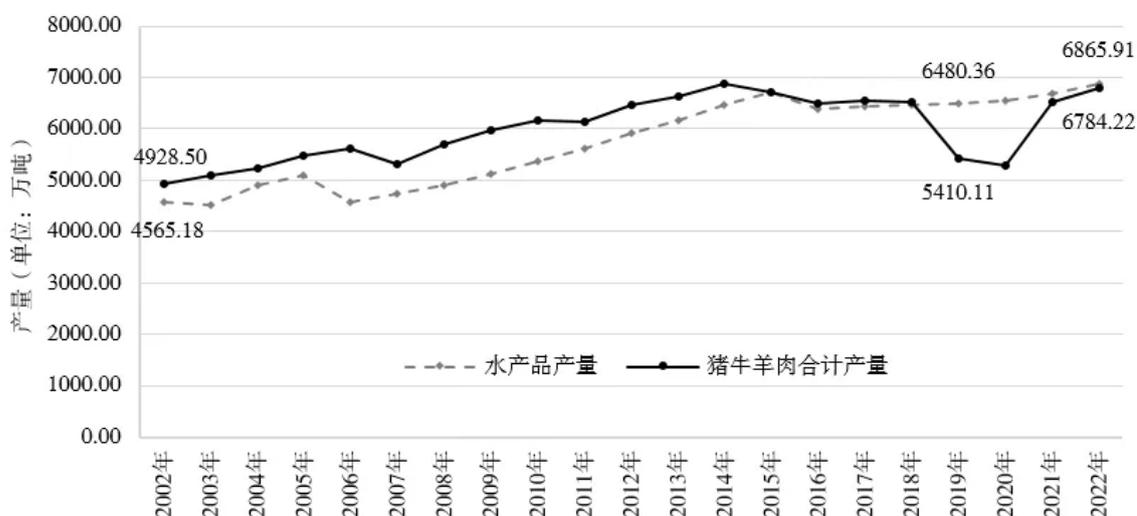


图1 猪牛羊肉合计产量与水产品产量变动情况

数据来源：《中国渔业统计年鉴》（2003-2023年）和国家统计局相关数据。

正是因为渔业是大食物系统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党中央、国务院历来高度重视渔业发展问题。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就指出，我国渔业发展有个方针问题，“应当以养为主”。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又多次指出，要树立大食物观，既向陆地要食物，也向江河湖海要食物，耕海牧渔，建设海上牧场、打造“蓝色粮仓”。解放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渔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新起点上推进渔业现代化建设、促进渔业高质量发展已经具备了较好的基础。实现高质量发展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历史、实践和理论统一。经济发展质量可以通过居民收入状况等经济成果分配情况、居民受教育程度

等人力资本投入、全要素生产率等经济效率水平及资源和社会状况等指标反映。因此，文章将分别从资源配置（水产品供给能力、渔业综合科技支撑能力）、经济效益（渔业产值与渔民收入）及社会效益（资源环境、国际影响力）等方面概述我国渔业的发展现状。

（一）水产品供给能力大幅提升

自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开始推进以养为主的方针以来，随着渔业科技进步、生产力发展及我国居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水产品产量和需求量持续增加。根据历年中国渔业统计年鉴数据和国家统计局数据，构建我国水产品产量和人均占有量的变动趋势图（图 2），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水产品供给量大幅增加。2022 年达 6865.91 万吨（包含远洋渔业产量），是 1978 年 465.35 万吨的 14.75 倍，是 1949 年 44.79 万吨的 153.29 倍。水产品人均占有量从 1978 年的 4.9kg 增加到 2022 年 48.6kg，年均增长 5.35%。

我国水产品供给能力的不断提升为粮食安全做出了巨大贡献，也因此跃升为全球水产品生产第一大国，深刻地改变了世界水产品供给格局和粮食安全保障水平。据估计海产品的蛋白质含量约为 7.7%，超过畜禽等蛋白质含量约 2.6% 的 2 倍，渔业食品至少提供了人均动物蛋白摄入量的 20%，且更容易被人体所吸收。全球范围内鱼类消费的增长率已经超过了人口的增长率和畜禽蛋白类产品消费的增长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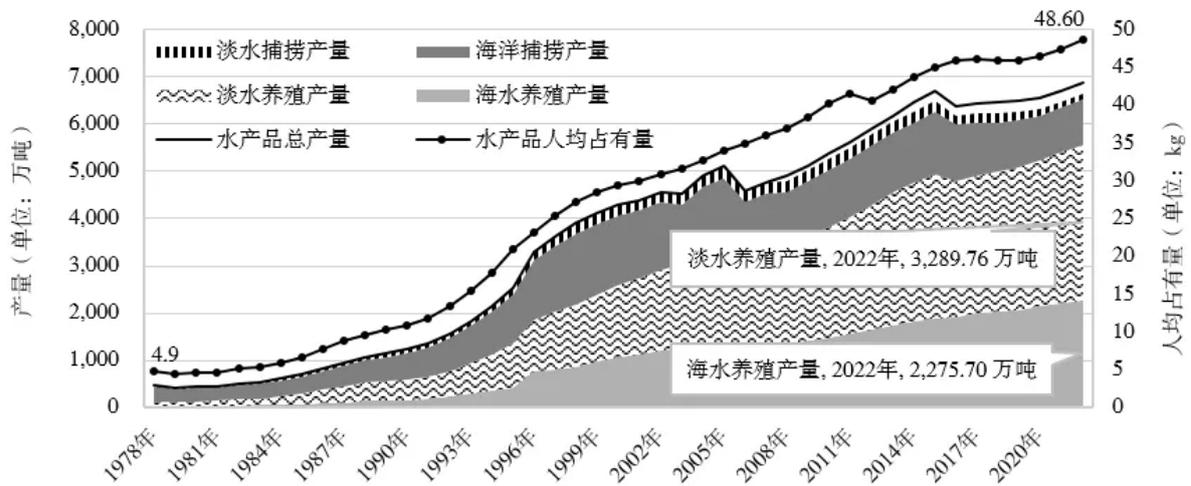


图 2 水产品产量和人均占有量变动趋势

数据来源：《中国渔业统计四十年》《中国渔业统计年鉴》（1988-2023 年）和国家统计局相关数据。

（二）渔业科技综合支撑能力大幅提升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渔业装备水平不断提升，极大地提升了渔业的生产效率。在海水养殖业中涌现了五次浪潮，淡水养殖业中技术也取得了巨大进步。“十三五”以来，我国渔业科技为资源养护与生态修复、遗传育种、健康养殖、病害防治、水产品加工、节能环保、渔业装备升级、渔业信息化等领域提供支撑保障，渔业科技进步贡献率由 2015 年的 58% 提高到 2020 年的 63%。近年来，海水养殖业正在兴起以现代海洋牧场和深远海养殖为代表的第六次浪潮，“深蓝 1 号”等深远海大型智能养殖渔场相继建成投产，2022 年 5 月 20 日全球首艘 10 万吨级智慧渔业大型养殖工船“国信 1 号”的交付运营，标志着我国深远海大型养殖工船产业实现了由 0 到 1 的进阶发展。在淡水养殖业中集装箱养殖、工厂化养殖、稻鱼（稻蟹、稻虾）综合种养方兴未艾。

（三）渔业产值与渔民收入均大幅提升

从渔业产值看，国家统计数据（图3）表明，2022年渔业产值达到15,467.98亿元，在大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从1978年的1.58%上升到2022年的9.91%，渔业经济效益和竞争力显著增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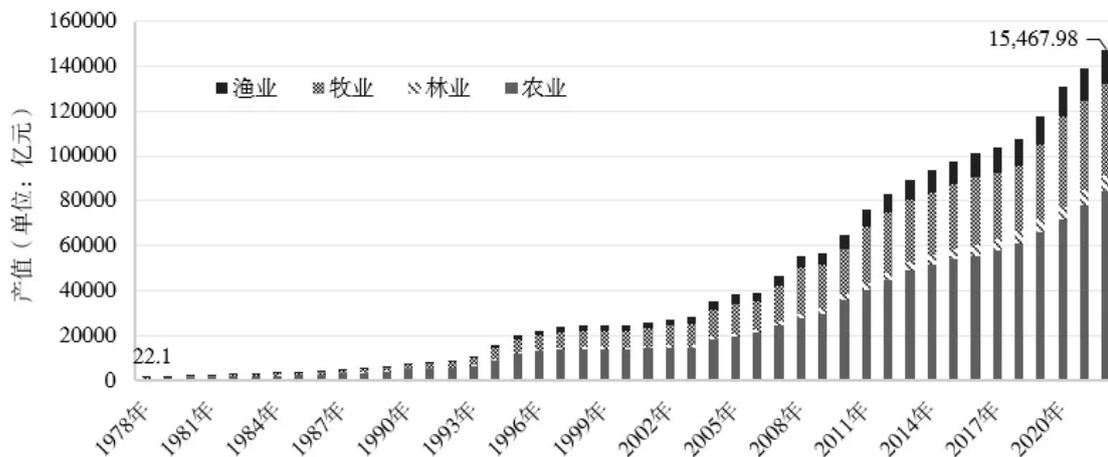


图3 中国农林牧渔业经济产值发展状况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从渔民收入看，历年中国渔业统计年鉴和国家统计局数据（图4）显示，渔民人均收入水平从1978年的93元上升到了2022年24,614.41元。1978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的134元是渔民收入93元的1.44倍，自1983年渔民人均纯收入超过农民人均纯收入。2022年，渔民人均纯收入达到24,614.41元，是农民人均纯收入20,133元的1.22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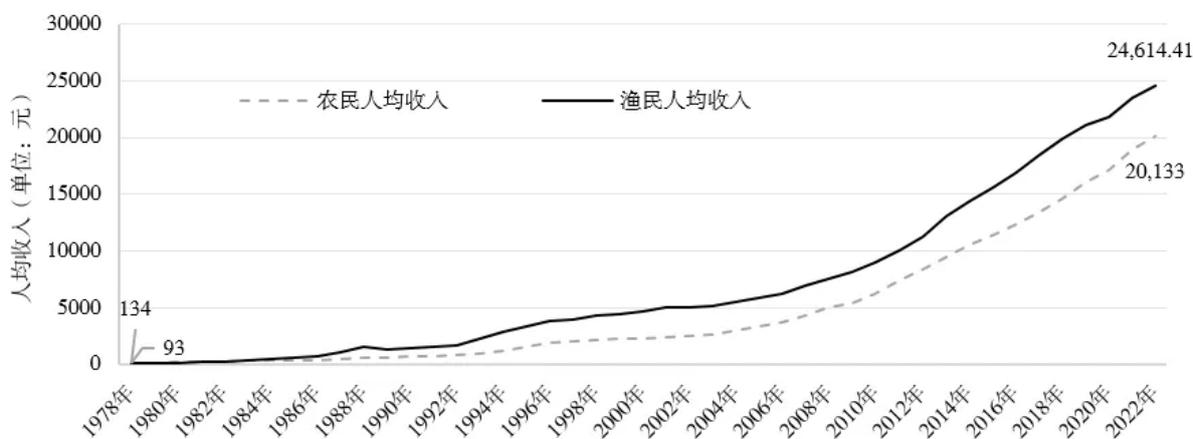


图4 1978-2022年渔民与农民人均收入变动情况

数据来源：《中国渔业统计四十年》《中国渔业统计年鉴》（1988-2023年）和国家统计局相关数据。

（四）渔业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不协调的趋势正在逐步扭转

在推进水产养殖业绿色发展方面，我国创造海水贝类养殖产量长期稳定增长（从1983年的28.28万吨增加到2022年的1569.58万吨）、青草鲢鳙鲤鲫鳊七大家鱼立体综合生态养殖、稻鱼（虾、蟹）综合种养等奇迹。《2021中国渔业统计年鉴》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养殖水产品产量4962万吨（不含藻类），占同期世界水生动物养殖产量8750万吨的56.71%，是全球养殖水产品（不含藻类）的主要来源，同时也是缓解我国渔业资源压力的主要手段。2022年全国养殖水产品和捕捞水产品的产量分别是5565.46万吨和1067.47万吨，在全国水产品产量（含远洋渔业）的占比分别是81.06%和15.55%，养

殖产量和捕捞产量差距进一步扩大。在增殖放流方面，“十二五”以来，全国已累计投入增殖放流资金近 124.9 亿元，放流各类苗种超过 4559.4 亿尾。在捕捞努力控制方面，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开始持续推进渔船数量与马力指标“双控”制度以压减海洋捕捞努力量。《中国渔业统计年鉴》数据表明，2022 年我国海洋捕捞渔船总数 12.91 万艘和 1300.73 万千瓦，比 2021 年的 13.21 万艘和 1331.59 万千瓦分别下降 2.44% 和 2.32%，比 2012 年的 19.42 万艘和 1327.08 万千瓦分别下降 33.55% 和 1.99%。在长江禁捕方面，划定了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全面实施了海洋渔业资源总量管理制度，开展了增殖放流活动，创建了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等。2022 年长江流域重点水域监测到鱼类 193 种，比 2020 年的 168 种增加 25 种，多数经济鱼类的平均个体重量普遍增幅在 15%-30%，珍贵物种长江江豚数量从 2017 年的 1012 头增长到 2022 年的 1249 头，实现历史性回升。

（五）我国渔业国际影响力大幅提升

我国渔业产量已连续多年居全球首位，通过水产养殖业的巨大发展为全球反贫困、反饥饿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国际渔业话语权得到大幅提升。我国顺应世界渔业发展的新趋势，多方位参与国际渔业治理规则顶层设计，与有关国家签署了 20 多个双边渔业合作协议。积极参加联合国国家管辖海域外海洋生物多样性协定（BBNJ），与周边国家联合增殖放流、澜湄水生物保护及渔业合作。积极参与《预防中北冰洋不管制公海渔业协定》、联合国大会可持续渔业决议、世界贸易组织等谈判磋商，成功举办第四届全球水产养殖大会和首届中国—太平洋岛国渔业合作发展论坛等，推动形成公平合理、可持续的国际渔业治理机制。

四、大食物观视角下中国渔业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问题

受资源和环境制约，我国食物持续增产压力加大，食物供求偏紧的局面将长期存在。同时，复杂的国际市场环境进一步影响我国农产品的贸易结构，加剧了我国粮食安全形势的不确定性。这就更加要求我国渔业供给体系需以其高质量运行来为大食物系统的供给能力提升做出贡献。尽管我国渔业发展已取得巨大成就，但与渔业高质量发展的“三高”要求相较仍任重道远。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从渔业供给体系质量来看，投入产出与中间投入品质量仍需提高

1. 尽管我国水产品人均占有量超过世界平均水平的 2 倍多，但人均水产品消费量与世界平均水平仍有较大差距。2022 年 4 月 26 日发布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再次强调了鱼肉水产类的重要性，建议居民每周最好吃鱼 2 次或 300-500g。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我国居民人均水产品消费量从 1978 年的 3.5kg/年增加至 2021 年的 14.2kg/年，距离膳食指南推荐的 300-500g/周（对应广义消费量约为 28.8-48kg/年），仍有较大差距。以 2035 年居民年均水产品摄入量达到“膳食宝塔”推荐量的中值为目标，人均广义消费量要达到 38.5kg/（人·年），王宇光等（2021）基于水产品生产供给与消费需求估算模型测算 2035 年消费需求要达到 9270 万吨，对应国内生产量则需要达到 8000 万吨，以 2022 年国内水产品产量 6866 万吨为基础，仍需增加 16.5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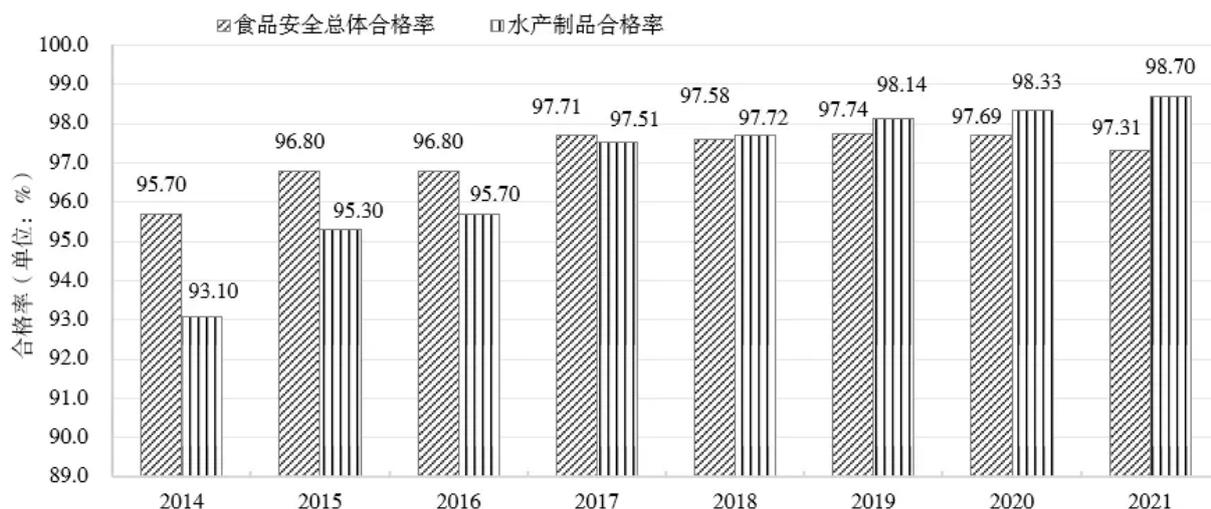


图 5 2014-2021 年我国水产制品与食品安全总体合格率

资料来源：根据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官方网站和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食品抽检信息整理所得。

就水产品质量而言，质量安全直接关系到人民的身体健康，但水产品药物残留超标现象仍然存在。当前我国水产品质量已大幅提升，如图 5 显示，我国水产制品的合格率逐年增加并于 2018 年超过食品安全总体的合格率，2021 年我国水产制品合格率达 98.70%，比食品安全总体合格率高 1.39 个百分点。然而，从生产环节的合格率来看，水产品的生产合格率仍低于所有农产品的总体生产合格率，详见图 6。

2. 从渔业资源生态系统质量来看，我国渔业资源生态系统尚未得到很好恢复。由于长期粗放、单一的生产模式使渔业发展面临资源枯竭与环境污染的双重压力，渔业资源养护方面缺乏一定的基础科学研究和生态系统管理等，近海渔业资源衰退的趋势仍未得到根本遏制。统计数据表明，无论是海洋捕捞还是淡水捕捞，我国单位捕捞努力渔获量（CPUE）仍然很低（见图 7），说明近海也好、内陆水域也罢，其渔业资源仍未完全恢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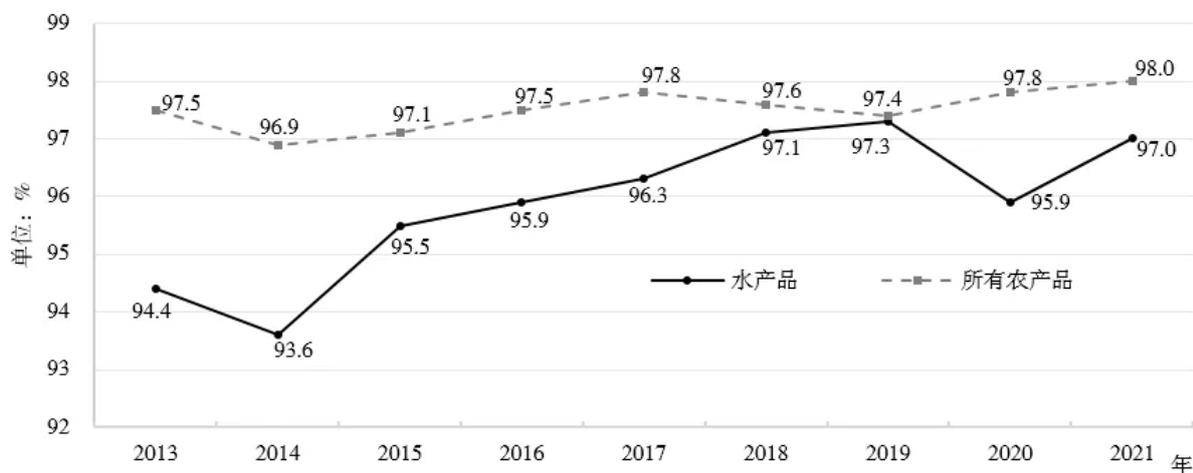


图 6 2013-2021 年我国水产品与农产品质量安全总体合格率-生产环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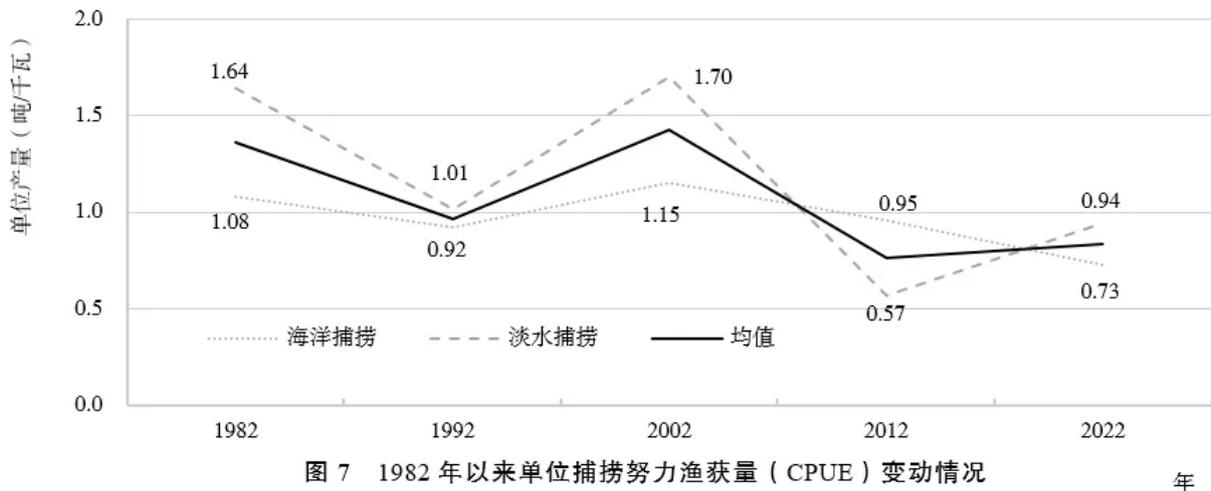


图 7 1982 年以来单位捕捞努力渔获量 (CPUE) 变动情况

年

数据来源：历年《中国渔业统计年鉴》数据计算得来。

3. 从渔业劳动力投入来看，产业组织化程度较低，人员素质和技术水平有待提高。总体而言，我国渔民的受教育程度与二、三产业的从业者在受教育程度上有较大差距，渔民的培训强度也在大幅下降，且专门从事技术推广和研发的技术人员缺乏。笔者调查表明，目前海洋渔业中的从业者老龄化严重，从业者绝大多数在 50 岁以上。由于缺乏必要的文化素质和技能且老龄化严重，部分渔业劳动力难以运用先进的渔业生产技术和装备，难以适应渔业现代化的发展要求。

4. 从中间投入品来看，苗种、饲料、病害防控用品的效度还需进一步提升。从水产苗种看，优质苗种需求强烈而供给能力不足，以海水鱼为例，在国家海水鱼产业技术体系跟踪的九大养殖品种中，良种选育研发滞后。从饲料方面来看，如何减少对野生鱼类饲料的依赖是产业发展面临的较为紧迫的问题。Froehlich 等（2018）指出对于大多数水产养殖生产而言，其饲料投入如鱼粉鱼油的生产主要来自野生鱼类，若以目前的速度使用鱼粉鱼油，产出的增长将受到这些野生鱼类减少的限制。以海水鱼为例，鲜杂饵料仍在广泛使用，饵料质量参差不齐，配合饲料原料进口依存度太高，饲料市场价格居高不下。从病害防控体系来看，挪威等水产养殖发达国家经验表明，疫苗防控是水产养殖提质增效的关键。然而，我国直至目前为止，仅有草鱼出血病活疫苗（GCHV-892）、鳃传染性脾肾坏死病毒灭活疫苗（NH0618）、大菱鲆迟缓爱德华氏菌活疫苗（EIBAV1）等为数不多的渔用疫苗。病害种类多、频发常态化、发病诱因复杂以及新发疫病不断出现等问题至今仍困扰着我国渔业高质量发展。笔者 2023 年沿着我国一万多公里海岸线的 152 户生产者调研结果表明，受种质、饲料、病害等因素影响，我国河鲀、大黄鱼、金鲳鱼、大菱鲆、军曹鱼、石斑鱼、牙鲆、海鲈鱼、半滑舌鳎的养成率仅分别为 80%、77%、75%、70%、62%、60%、60%、46.3%、30%。

（二）从渔业供给体系效率来看，水产养殖 GTFP 仍存在巨大提升空间

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TFP）宏观层面上关系着国家经济的发展质量，微观层面涉及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资源配置等问题，是社会生产条件下劳动生产率的重要内容。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ree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GTFP）、推进水产养殖绿色发展是中国现阶段渔业产业发展的重要任务。实证结果表明，从海水养殖业来看，1982 年以来单位海水养殖水面产量、单位劳动力产量有所增加，但若把环境污染等非期望产出计算在内，则我国海水养殖业绿色发展水平仍需大

幅提升；从淡水养殖业来看，“十一五”以来，中国各省份淡水养殖业 GTFP 均值总体呈波动上升的趋势，由 2006 年的 0.561 升至 2021 年 0.984，但其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GTFP 均值依然小于 1，反映我国淡水养殖业 GTFP 仍然存在一定的提升空间。

（三）从渔业供给体系稳定性来看，存在水产品加工业发展滞后、饲料原料进口依存度高、养殖保险体系不完善等问题

首先，就目前我国渔业产业链而言，加工业发展滞后，其在产业链中的“稳定器”功能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大食物观下渔业发展的稳定性目标需要通过高新技术提升渔业产品供应链的稳定性，实现全产业链的纵向融合。然而，根据历年《中国渔业统计年鉴》数据，水产品加工产值在渔业总产值的占比从 2007 年的 40.68% 下降至 2022 年的 30.93%。由于水产品属于易腐性产品，水产品加工的滞后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其市场拓展，降低了广大居民水产品可获得性。Naylor 等(2021)及 Ryckman 等(2021a, 2021b)指出，从全球范围看，多数情况下，水产品仍是关键营养元素摄取的主要来源。就我国而言，农村居民水产品消费也远低于城市居民，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1 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水产品消费量为 10.9kg，仅为城市居民的 65.27%。如何推进水产品加工业的发展已经成为了渔业高质量发展中必须高度关注的问题。特别需要关注的是，受近几年新冠疫情影响及近期日本核废水排海等冲击，近期水产品国内消费者信心不足，而国际针对我国渔业的打压升级，水产品加工企业面临需求下降而产能调整困难、资金周转紧张等多重压力。

其次，水产养殖所用饲料的原材料进口依赖度高，饲料价格与品质波动大。作为水产养殖的基础，饲料主要由鱼粉、谷物原料和油脂等制成，鱼粉和谷物原料往往占到饲料成本的 50% 以上。然而，鱼粉等进口依存度过高，伴随外汇汇率上升，饲料成本大幅上涨（详见图 8）。调查表明，为应对鱼粉价格上涨而带来的成本影响，饲料生产商要么提升渔用饲料价格，要么为维持饲料价格稳定降低饲料中的鱼粉含量，由此则进一步导致了饲料质量不稳定，最终直接挤压了养殖生产者的利润，如果通过延长养殖生产周期或降低养成率而使养殖生产者受损，则又会威胁到水产养殖生产的稳定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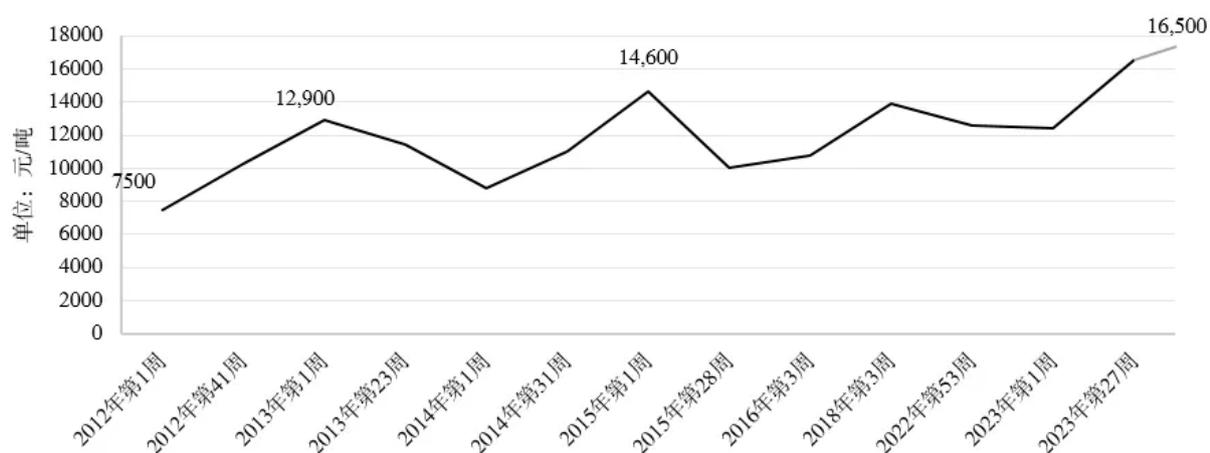


图 8 上海港秘鲁普通级鱼粉价格波动图

数据来源：中国饲料工业信息网--<http://www.chinafeed.com.cn/yufen/>。

四、推进我国渔业高质量发展、优化大食物系统的对策建议

食物生产对气候、生态、资源、环境的影响是巨大的，技术改进、管理规范、避免浪费等措施需协

同作用才有可能改善食物系统对地球资源的破坏。高质量发展不仅是经济方面的要求，更是经济社会多方面发展的总体要求。推进高质量发展要坚持创新的核心地位，促进结构的协调优化，构建生态文明体系和对外开放格局。创新效果与劳动力的知识水平高度相关，通过水产养殖绿色发展等增加人均水产品占有量、提高渔业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潜力是巨大的，而这种潜力的发挥不仅取决于渔业体制机制的改革，也取决于种苗、饲料、病害防治、养殖模式等技术创新。

（一）加强质量监管，保障渔业供给体系质量

建议相关主管部门从条件相对成熟的主要养殖品种开始，尽快分品种制订苗种质量标准并加强监管。另外，养殖生产过程监管问题也需要引起重视，以养殖过程中产生的垃圾为例，目前对生产过程中所用到的各种包装袋的回收监管是缺失的，由此造成众多塑料包装袋被遗弃在池塘边和海洋里，对水域生态环境产生了不良影响。为此，建议多部门联动，建立“谁生产、谁回收”的监管制度。从增殖与捕捞业来看，关键是要提升内陆水域及近海生态系统质量的监管。从渔业产业链来看，不仅需要持续做好流通、加工产品质量监管，也需要加强对餐桌浪费的监管。多次水产品安全质量事件的发生已经表明，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偏好消费鲜活水产品的国家而言，流通环节的监管是保障水产品质量的重要环节，建议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牵头、协同农业农村部等相关部门，加强水产品全程质量安全监管，尤其是流通过程中水产品投入品的使用监管。同时，建议引导大众的观念从消费鲜活、冰鲜水产品向消费冷冻、加工水产品转变，同时加强对餐饮企业餐桌浪费行为的监管。

（二）坚持科技创新，提升渔业供给生产效率

在养殖水域生态技术方面，建议重点加强循环水养殖、尾水处理等技术研发与推广。在优质苗种供给方面，建议不仅重视针对养殖品种的抗逆性状、雌雄差异等影响养成率方面的科技创新，还要重视针对成长速度等影响养殖周期的科技创新。在饲料科技方面，鱼粉替代型高质量全价配合饲料的研发应当受到高度关注。在病害防治方面，建议以防为主，重点加速水产疫苗防控技术的研究与应用。在养殖模式方面，建议加强水陆（海陆）接力、分阶段专业化生产模式的研发创新。在设施设备方面，建议加强深远海养殖所用的设施设备（如抗风浪深水网箱、清洗网箱的水下作业机器人）等研发。在加工领域，建议在重视预制菜等适销产品之技术研发的同时，重点提升加工产品品牌塑造力，加快市场拓展，引导消费模式转型。在流通领域，建议重点加强低温物流、冷链物流技术创新。

（三）以制度创新为引领，为构建稳健的渔业产业链提供保障

为防范渔业生产的高风险，建议以政策性保险为引领，以商业保险和互助保险为基础，再保险为保障，构建我国渔业保险体系。考虑到捕捞业中船东互保等体系已相对完善，建议近期以水产养殖互助保险、政策性保险及再保险为重点，推进保险体系的完善工作。为更好发挥其产业链“稳定器”的功能，建议进一步落实帮助水产加工企业融资脱困的支持政策，完善加工水产品的差异化开发及品牌塑造之引导政策。作为全球最大鱼粉消费国和水产养殖大国，要构建稳健的渔业产业链、实现渔业高质量发展，开发鱼粉替代型全价配合饲料势在必行。建议加大对这一领域科技研发的项目支持，并建立鱼粉替代型全价配合饲料的生产、使用补贴政策，引导养殖生产者转变饲料使用行为，逐步朝着使用此类饲料的方向转变。

（四）加强渔业经济管理相关领域研究，为促进渔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学理支撑

一是加强基因编辑等品种选育、疫苗防控、配方饲料、养殖新模式等渔业高质量发展重要支撑技术

的经济研究，为关键支持技术的研发提供参考。二是加强主养产品及土著品种增殖放流等生物经济模型的构建与应用研究，为水产养殖模式优化与近海渔业资源有效开发和利用提供依据。三是加强气候变动对渔业经济结构、布局、稳健性的影响研究，为应对气候变动对我国乃至全球渔业影响提供学理支持。四是加强大数据赋能渔业高质量发展的经济研究，为促进渔业现代化进程贡献成果。五是加强渔业高质量发展的制度创新研究，为渔业经济体制机制的进一步改革提供方案。

（作者单位：上海海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来源：《中国渔业经济》2023年第41卷第六期，完整版请查看期刊纸质版或电子版）

不应把县城设计成农民去城回乡的必由之路

刘守英

现代化讲求的是人要寻求外扩的改变模式，而如果人与乡村的粘性一直保持不变，那就是传统社会。改革开放之后，“农一代”们可以选择离开村庄、在城市里打工、赚钱、看看外面的世界。他们可以换一个活法，也有了更多途径和机会改变自己和家庭，也就是“可能性边界”扩大了。

应该充分认识到“农一代”一整代人对整个中国现代化的贡献。如果他在城里工作了大半辈子，他的家庭也在城市里延续，我们应该给他们一个留在城里的机会，供他们自主选择，而不是让他们觉得自己只有回去的命。

应该重视已经回乡的老人的体面问题，不能让他们“贡献一生、自生自灭”。因为他们原本是靠传统的家庭制度养老，也就是养儿防老。但现在他们的儿孙都在城市，他们在农村只能自己防老。到了他们真走的时候，可能只有一场农村的隆重的葬礼，但那只有外人能看到，他们能得到什么呢？

想要解决现在的农村养老问题，非常正式的制度都不可持续，纯市场化的行为也一样。因为农村老人太分散了，一旦做规模化的养老院等举措就不经济，对于市场来说挣不到钱，财政投入也很难长期保证来源。比较好的方式还是在农村有人自发地想办法。

老人在农村的基本经济保障也要完善，这让他们不再需要问儿女要钱、有了尊严。

相比“农一代”，“农二代”是很多是80后，其中一些十几岁就来城里打工，与城市的联系更深，他们的预期也是想在城市体面地落脚。在城里工作20多年后，他们也快五十岁了，很快他们也要面对和上一代一样的问题：我的命是不是就该回农村？这影响着他们对自己、对家庭和孩子的规划。这其实都是现代化的重大问题，城市化、工业化还是国家现代化的归宿，这样社会才能不断进步，而不能让大量的人都留在农村。我们现在不能笼统地说要让农民市民化，最关键的问题就是能不能给他们留在城市的选择，制度性的户籍、住房、孩子教育等问题能否被妥善地解决。

在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中，农村的人变少、农业在经济中占比降低是规律。一个社会的农村人口保持太高的比例，这是社会的问题。进城务工的农村人体面地在城市留下来之后，乡村和农业都可以聚集，农业也可以规模化。而对于已经回到农村的“农一代”的养老问题，就应该回到保障措施。但是我们应该把农二代往城里拉，而不能让他们再次被动地被推回农村。

介于城市和乡村的县城似乎可以作为一个“中间地带”供农村的务工人员选择。它的平衡城乡之间“中间性”的作用是否该被强调这件事我比较犹豫。县城确实是农民城乡转换的重要枢纽：农民进城之前可以先在县城落脚，到了退休的年龄又不想回乡也同样可以选择县城。但是如果把县城设计成一个农民去城、回乡的必由之路，这是否符合现代化的规律，我是不确定的。

我认为，还是可以保留县城这个“城乡通道”，也就是农民在去城、回乡的途中可以选择生活成本

低、生活方式接近乡村、交通便利的县城。但只是作为一个选择，而不能是必由之路。

现实中很可能存在这样的情况：一个农民在北上广工作 40 年，他自己也愿意留在一线城市养老，但是政策和现实不允许，他也不想回到农村生活，因此选择了县城。但如果他有机会留在大城市，他不一定会做出这个选择。除此以外，县城不能支撑太多的产业和经济活动，在县城大量投资是不经济的。大城市就不一样，产业集聚就能推进创新。所以需要保证把县城的公共基础设施做好，让它能是一个体面的、能好好生活的地方。但它终究难以替代大城市。

东亚其他国家的乡村转型，对于中国来说一个重要的启发，就是需要保留村落，让它作为一种制度、一种空间能够被留存下来，这很重要。日本的乡村面貌就保留得比较好，即便他们的乡村也没有太多人，有也多数都是老人，但是有基本的公共设施。其实也不用搞过头，例如不用重投资在村里新建工厂，但可以开一趟能到达偏远农村的慢火车，从村里出去的人能够在需要时方便回去。

如果村里有好的基础设施、交通便利，同时还能保留好的公共空间、文化和人情，这种“根”还会延续。打个比方，每到节假日，他们可以把他们的村子当成“诗和远方”，作为一个休息的地方。

不过，我们确实也没有精力把所有村落都这样规整。可以把周围的村子聚集成为一个有特色和生活区域，让返乡人对于“回到家乡”有感知，这可能比“回到老屋”更重要。这种聚集也有利于缓解现在分散的村落没有人气的问题。

中国社会的转型，就是要慢慢从传统的熟人关系里脱出。过去，我们认为一个人成功后需要把大家带起来，在当时的阶段这种观念是有意义的。但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需要每个人走向独立、走向制度化、非人治化，这对于社会进步非常重要。不能让少数人对这个社会承担太多责任。

（作者：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教授。来源：宏观经济智库微信公众号，2024 年 6 月 14 日）

资源性质如何影响村级治理

贺雪峰

【内容提要】：由村庄集体来供给农村公共物品，就是“村社-农户”的短循环，这与“国家-农户”的长循环是完全不同的。“村社-农户”的短循环可以精准表达出农民对公共物品的需求偏好，可以采用最符合村庄实际的公共物品供给方案，可以最大限度调动农户参与村庄公共事业的积极性。“村社-农户”短循环必然要以民主为前提，村民自治是最好的载体，党建引领基础上的群众工作是村级治理的核心内容。一旦农户可以组织动员起来形成一个有活力、有主体性的基层社会，这个基层社会就可以与国家相配合。将部分国家资源划拨到村社集体，按照集体体制使用国家划拨到村社的资源，将国家资源变成集体资源，国家不再只是代替农民为他们做好事，国家资源下乡也就不再是慈善事业，而是通过资源下乡激活村社集体经济，动员村民参与到建设自己美好生活的事业中来。只有基层群众建立了对自己生活负责的体制，他们才能有主动性、有主体性，这样的治理才能更有效，这样的建设才可持续。

【关键词】：乡村治理 资源下乡 项目制 治理效能

一、引论

2006年取消农业税后，国家不仅不再从农村汲取资源，而且大规模向农村转移支付，过去主要靠农村内生供给的农村基本公共物品也基本上被国家包揽。国家供给农村基本公共物品的办法主要是由部委办局通过项目向农村转移资源，在这个过程中，乡村干部的主要作用是协助上级项目落地。农村基本公共物品供给数量、水平和方式，以及项目工程实施，均由自上而下的条条决定，本质是国家直接面对农户。

可以认为，乡村治理是严重受制于国家与农民关系的。取消农业税前，国家往往通过向乡村下达税费任务，由乡村干部来完成向农民的汲取，乡村治理是以向农民收取税费为基础展开的。汲取税费就要与每个农户打交道，就要对拒绝缴纳税费者采取强制措施。采取强制措施之所以可以进行，除了有国家做后盾，也与村庄动员有关，即村民认为应当缴税且缴纳税费的方案相对公平，否则，乡村干部的强制就会引发众多农户的积极或者消极对抗。取消农业税以后，国家向农村转移资源，乡村治理的主要工作就是负责项目的安全落地。这与之不同，因为项目落地只涉及极少数农户，针对极少数农户的工作与针对全体农户的工作有极大不同。

当前，国家资源下乡对乡村治理的影响，与资源下乡的数量和方式有很大关系。从数量上讲，国家惠农资源已连续多年超过2万亿元，每年惠农资金只增不减。国家开始的目标是为农村提供与城市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现在已由基本公共服务延伸到建设美好生活上来，典型的是村庄环境整治和美丽乡村

建设都有越来越多国家财政资金投入。超出基本公共物品范畴的美好生活建设投入还主要集中在示范点上，虽然没有全面推开，投入力度却很大，往往一个美丽乡村建设点的投入就有上千万元。此外，诸如特色小镇、农业综合体也都有国家巨额资金投入。

资源下乡方式也对乡村治理有重大影响。当前国家资源主要通过项目下乡，国家直接设计项目、管理项目及对项目进行检查验收评估。也就是说，国家进行项目建设基本上都是直接面对农户，乡村组织的主要工作是协助国家项目落地，乡村治理因此必然会以完成上级任务、接受上级检查为主要工作，也就必然会变得更加行政化。若将一部分下乡资源作为村庄公共服务资金，直接下拨到村集体，变成村集体资源，由村民通过民主方式决策如何使用资源，村级治理的重要工作就将围绕村庄公共服务资金的使用展开，这个时候，村庄内部动员和群众工作就会变得极其重要。

本文试图讨论这样一种可能性，即通过改变国家资源下乡的方式，将部分国家资源转化为村庄集体资源，重新激活村庄活力，激活农民参与，真正将农民组织起来，让农民自己建设自己的美好生活。

二、两种不同性质的公共资源

从村级治理的角度来看，有两种不同性质的公共资源，从而可以形成两种不同的公共物品供给方式，以及两种不同的村级治理模式。这两种不同性质的公共资源一是国家性质的公共资源，一是集体性质的公共资源。

取消农业税之前，农民负担主要包括四个部分：一是农业税，二是“三提五统”经费，三是共同生产费，四是其他各种集资摊派，此外农户还要承担“义务工和积累工”。这几个部分中的相当部分，比如“三提”、“共同生产费”和“两工”，都主要用于村庄内公共事业建设，而农业税、“五统”经费和各种集资摊派大都要上缴，用于超村庄公共事业建设，比如教育事业。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后，地方政府收入主要依靠农业税及向农民征收的各种集资摊派。国家向农民收取税费要依托村干部，如何使用这些资源则与村庄基本无关。村集体内部公共事业建设主要依靠村内筹资筹劳，因为村庄公共事业建设与村民利益密切相关，村民高度关注，甚至高度介入，一般来讲，很少会出现筹资筹劳资源乱用的情况。这些资源用于建设农户一家一户不好办、办不好以及办起来不划算的事情，起到了“1+1>2”的效果，资源投入效益很高。缺点是一旦有农户想搭便车当钉子户不愿出资出劳，集体强制力又不够的时候，筹资筹劳水平就会比较低，如果大量基本公共事业建设不起来，农户生产生活就会受到影响。

取消农业税前，在集体经济不够发达的村庄，农村基本公共物品供给水平相对较低，有些村庄出现普遍的农户拖欠税费现象，从而影响了农村基本生产生活秩序。集体经济发达的村庄，因为有集体资源，不需要向农户筹资筹劳就可以为农户提供较高水平的公共服务，就具有有序的生产生活秩序，较少出现因为公共物品不足导致的生产生活效益受损现象。

取消农业税后，之前由农民承担的用于村庄以外公共事业建设的资源由国家通过财政转移支付来补足。相对来讲，国家向地方政府转移支付的部分不及过去从农民那里收取的多，因为转移支付只对应了地方政府过去向农民征收的正规税费，而实际上还有很多其他摊派。同时，不再向农民收取税费，地方政府也就没有积极性再介入村庄具体事务，如不愿介入村庄公共物品的供给。取消农业税后，农村公益事业建设情况反而不如取消农业税前，“一事一议”设计在实践中根本就行不通。国家也就不得不在向地方政府转移支付之后不久，即开始介入农村基本公共物品的供给，逐步形成当前国家包揽农村基本公共物品供给的现状。

当前，农村基本公共物品供给基本上都是依靠国家资源，主要是通过项目建设来实现。国家通过各个涉农部委办局直接为农户提供基本公共物品。建设什么项目，按什么标准和程序建设，由谁来建设，谁来验收，都是由上级部门说了算，乡村主要工作是协助上级部门的项目落地，作为项目实际受益人的农户则少有发言权与发言的欲望，因为农户认为国家投入的资源越多越好，效益如何无所谓，资源投入建设项目后哪怕没有发挥作用，农户也不心疼，因为这本来就不是自己的资源。

国家直接为农户提供基本公共物品存在三个问题：第一，自上而下的公共资源与农户自下而上的公共物品需求偏好如何对接是个难题。对于国家资源，农户的态度必然是多多益善。第二，自上而下资源转移的标准化、规范化要求如何与农村千差万别的实际有效衔接？项目落地究竟是否允许因地制宜？如果不允许因地制宜，项目就难以发挥作用，允许因地制宜，地方就可能变通，导致国家专项资金被挪用。第三，国家资源通过各个部委办局下乡搞建设，就是各个部委办局推动项目标准、程序、规范下乡的过程。各个部委办局为了资源安全，必然按最高要求制定标准，并按最高要求对基层进行检查监督，结果，大量高要求项目下到基层，基层治理主要就是按上级要求协助完成上级安排的任务，应付上级监督检查。国家直接下乡到农户的资源越多，基层干部就越忙，而基层治理资源有限，基层就可能以形式主义来应对上级任务，形式上严格按程序和要求完成了上级任务，实际上大多只是书面工作，办事留痕也只是为了应付上级检查，规避被问责的风险。与此相关，乡村治理中乡村干部既没有必要去做群众工作，动员群众，因为不再需要从农户那里筹资筹劳了，实际上也没有时间、精力和资源去做群众工作。村级治理严重行政化。

与由国家资源直接供给农村基本公共物品不同，村社集体供给基本公共物品就是另外一种逻辑。

历史上，村庄公共物品基本上都是借内部筹资筹劳供给的，因此，历史上的村庄公共物品供给就有两个过程：一是资源筹措的过程，即如何分摊公共物品供给的成本，如何确定受益范围与程度。村庄必须为此进行讨论并形成具有高度共识的意见（达成妥协），如果有农户拒绝分摊筹资筹劳的责任，村庄就必须有办法进行惩罚，否则就会有人效仿，最终造成筹资筹劳的失败。村庄筹资筹劳的过程就是村庄辩论、形成妥协、达成共识的过程。因为涉及切身利益，所有农户都被高度卷入，因此，村庄具有政治性和公共性，村民是被高度动员起来的，具有强大的约束钉子户的能力。二是资源使用的过程，即供给什么公共物品和如何供给。因为资源是从村庄筹集的，资源如何使用到最重要的地方，如何最高效使用资金，这些问题就会受到村民的高度关心，因此，基本上不会出现资源使用的低效与不匹配现象。农民可以用最少的钱办成最大的或最重要的事。

传统时期农村内生供给公共物品存在的问题是，因为农民收入有限，筹资筹劳水平比较低，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水平也因此大都只是底线式的。取消农业税前后，全国农村通过“一事一议”来筹资筹劳供给公共物品的实践效果也不好，原因是进入 21 世纪，农民收入多元化，村庄边界开放，对钉子户的规制能力大幅下降。

中国农村是集体所有制的，有一些村庄有比较多的集体资源，这些村庄供给公共物品就不用向农户筹资筹劳。因为集体资源属于村社集体所有成员，如何供给村庄公共物品和供给什么样的村庄公共物品，就必须经过村民决策。因为有集体资源，不用向农户筹资筹劳，也就不会因为钉子户导致筹资筹劳的失败。集体资源已有保障，只要村民通过讨论，认为可以用集体资源提供公共物品和按什么办法来提供公共物品，即使有人反对也是无效的，因为集体资源如何使用是走过了村庄民主程序的，民主决策并不要

所有人同意，而只要大多数人同意。

由村庄集体来供给农村公共物品，就是“村社-农户”的短循环，这与“国家-农户”的长循环是完全不同的。这个短循环可以精准表达农民公共物品需求偏好，可以采用最符合本村实际的公共物品供给方案（因地制宜），可以最大限度调动农户对村庄公共事业的关心。这三点都是“国家-农户”长循环所缺乏的。

在当前时期，“村社-农户”短循环必然要以民主为前提，村民自治是最好的载体，党建引领基础上的群众工作就是村级治理的核心内容。党的领导和动员群众通过民主方式来建设自己的美好生活，就是对这个短循环之于村级治理的高度概括。一旦农户可以组织动员起来形成一个有活力有主体性的基层社会，这个基层社会就可以与强国家相匹配。

现在的问题有二：到底什么是集体？集体资源从哪里来？

三、集体经济的两个典型与理想模式

中国农村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制度设施，就是中国农村是集体所有制，农村土地属于集体所有。按“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设计，最基本的集体单元是生产队，土地属于生产队集体所有。当前，在全国大部分地区，由生产队演变而来的村民小组的功能大大弱化，作为农村基层建制的行政村越来越多地成为实际上的农村集体土地所有者。当然，全国情况差异很大。本文所讨论的农村集体所有单位主要是指与农村经济合作社合一的行政村，我们可以称之为村社集体或村集体。

当前全国有大约2万个集体经济比较发达的村庄，主要为城中村、城郊村和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村庄，以苏南和珠三角数量最多也最为典型。苏南集体经济与珠三角集体经济构成了两种不同类型。

（一）集体经济的两个典型

第一个典型是苏南集体经济。以苏州为例，目前苏州定义集体经济薄弱村的标准就是村集体年收入低于400万元。苏州帮扶集体经济薄弱村的办法十分简单，就是给村集体特批几亩建设用地指标，村集体通过建设用地指标获得村庄建设用地，在建设用地上盖房子出租，租金就可以改变经济薄弱的状态。

之所以批几亩建设用地指标就必定赚钱，是因为整个苏南地区乡村已经工业化了，苏南农村已经融入沿海城市经济带，成为沿海城市经济带的内在组成部分。在城市带内，土地是稀缺资源，尤其是建设用地，具有远超农地的价值。一般来讲，苏南农村土地大都仍然有农地，如果有了建设用地指标，将农地变成建设用地，在建设用地上搞建设，建酒店、其他三产或建厂房出租，就可以获得远超建筑成本的租金。经济越繁荣，用于工商业用途的土地价值越高，在苏南、珠三角等沿海城市经济带内的农村，既可以享受城市经济繁荣的好处，村集体又正好占有大量土地（包括农地），这些土地就是村集体最主要的资源，村集体几乎不用承担任何风险就可以获得大量集体经济收入。

苏南村集体经济也有特殊性，其中最重要的有两点：一是很少有村集体分红，二是集体收入高的村庄，基础设施就用村集体资源建设，集体经济薄弱的村庄，基础设施就由政府来投入。这样来看，苏南村集体经济似乎与村民关系不大，有点“一大二公”的意思，这种“一大二公”还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前面讲到集体经济薄弱村，地方政府就下拨建设用地指标让集体经济摆脱薄弱状态；二是苏南经常通过富村结对周边相对穷的村，以富带穷，共同富裕；三是苏南村干部尤其是村支书在不同村之间或村镇之间调整的现象十分普遍，由一个村的村主任调到另外村当书记，或由一个村的书记调另外村当书记，十分普遍。村集体有大量集体经济收入，有大量宝贵土地资源，村民却似乎并没有特别强烈的“唯我所

有”的“独占”想法，没有必须用集体收入“分红”的诉求，村庄具有相当的开放性，不仅向其他村庄开放，更对国家开放。结果就是，苏南村集体经济越强，国家在村庄内的掌控力越强，苏南的强集体支持强国家。苏南村集体经济与我们通常想到的基于集体成员内强烈共同占有诉求基础上的集体，还是有所区别的。

之所以苏南会形成这样一种村社集体经济，与苏南乡村工业化的起点有关。早在20世纪70年代，苏南农村就发展乡镇企业，而当时随便就可以将集体土地用来搞建设，最不缺的就是土地与劳动力，最缺的是资金、技术与管理，资金可以以集体名义向银行贷款，技术和管理的则要靠村干部尤其是村支书到外面去引进和学习。一个有作为的村支书通过个人努力，以集体名义引进技术、贷款，在村集体土地上建厂，再生产产品销售出去赚钱。本村农民由此获得了“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务工机会。因为当时还没有分田到户，土地本来就是集体的，所以，苏南乡村工业化中，看起来起最大作用的是村集体及村支书，其他方面则没有那么重要。

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苏南很多集体所有制乡镇企业关停，已用于建设的村集体土地变成农村集体建设用地。苏南开始大规模招商引资，之前乡镇企业建设用地转而变成招商引资用地，村集体将土地租给外来企业，或直接建厂招租，获得土地租金或房租，这就成为当前苏南村集体的主要收入来源。这个集体收入与其说是农民努力产生的，不如说是国家政策特许的。因此，苏南农民对村集体经济的掌控感比较弱，国家有能力对村集体经济进行实质性的平调。

第二个典型是珠三角农村集体经济。珠三角农村与苏南农村同属东部沿海城市经济带，具有良好地通过出租土地或厂房获得租金从而保持强大村集体经济实力的条件。

因为乡村工业化的路径不同，珠三角农民对村集体经济具有完全不同于苏南农民的认识。珠三角乡村工业化是从20世纪80年代发展“三来一补”企业开始的。20世纪80年代已经分田到户，珠三角农民也一直有较强的土地占有观念，分田到户以后，农户就认为土地是自己家的了。改革开放后，中国加入世界体系，成为“世界工厂”，珠三角成为重要的“制造车间”。珠三角乡村工业化一开始就是招商引资，村集体将土地租给外来企业，外来企业建厂招工，工人也是外地来的。资本、土地和劳动三大要素，资本和劳动都是外来的，当地村集体通过土地参与到生产中来，获得土地租金（或建厂招租获得房租），所以，珠三角村集体经济收入来自土地。而土地又是已经分到各家各户的，只不过各家各户的土地太过分散，且是农地，无法参与乡村工业化过程，于是村集体将农户分散的土地集中起来，招商建厂。以前农民靠种田赚钱，现在靠出租土地赚钱，珠三角农村将其集体经济称为“共有制”，农户用承包地入股来形成村社集体，村社集体收入就应当是农户所得。后来珠三角一度推动农村股份合作制改造也是出于这样一种理念。在珠三角农民的观念中，集体不过是农户土地入股形成的，所以集体归根结底是由一个一个农户组成的，不存在超越农户个人的集体，这种集体产权就是可以分割且排他的，这点与苏南的集体含义正好相反。所以，珠三角地区虽然集体经济收入很多，农民对集体经济收入却盯得特别紧，绝对不会允许集体经济平调，甚至不允许用集体经济收入去提供公共物品，而有强烈的分红诉求。

可见，珠三角村集体经济越发达，就越是容易封闭起来，形成排他性的“土围子”，这个“土围子”甚至会排斥国家权力的介入。珠三角地区“城中村”改造动辄要花上百亿元也与此有关。结果就是珠三角村社发达的集体经济并没有带来良好的公共物品，反而形成土地食利者群体。

从这个意义上讲，当前中国集体经济发展最好的苏南和珠三角农村，都主要是受益于东部沿海发达

城市经济带的好处，资本积累主要来自土地租金收入，这在中西部农村不可能复制。苏南和珠三角集体经济的极大差异也提示我们，没有一种固定形式的集体经济。

（二）集体经济的理想模式

苏南、珠三角地区村集体经济显然有着相当不同的含义及运作机制，也因此基层治理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从上文可以看出，苏南、珠三角地区村集体经济发展与乡村工业化的独特历史有关，对其存在着显著的路径依赖。苏南村集体经济存在的问题是集体性略显不足，村集体受到上级过大的影响，村民参与感与利益连带性严重不足。珠三角地区集体经济存在的问题与苏南相反，村民大都认为村集体是由村民（股民）利益集成而来，村民因此主要关心将集体经济分红，而不关心甚至反对用集体经济办村庄公共事业。

鉴于此，笔者以为，作为一种理想型村庄集体经济应当具有四个特征：

第一，集体不是私人的集合，集体不可以分割成为个人。正是因为其超过私人而不可分割，集体才具有不同于私人的行动逻辑及特征。

第二，集体资源主要用于集体公共事业，事关集体中每个人的利益，是集体所有人共同追求美好生活的依托，也因此，集体中的每个成员都关心集体，对集体负责。

第三，因为有集体资源，村庄就存在集体与每个农户之间的经济往来与债权债务关系，也就为村集体每年对全村农户“算平衡账”提供了基础。村庄活动产生的权责利并不立即结清，可以记入集体账上，到年底或必要时期进行总结算，多退少补，形成村集体内权责利的平衡。没有人可以逃避责任与义务，每个人也都可以享受权利。

第四，因为第一，村集体资源不能平分掉，因为第二，村集体负责人不能独断专行，资源不能被平调到其他地方。当前，所有集体成员都是平等的，不存在对个人的强制，所有决策也都必须是民主的，只有多数人同意时集体资源的使用才是合法的。民主、公正和平等是村集体资源使用的三大原则。

以上只是讨论理想型村集体经济的运作规则，村集体资源从哪里来？苏南和珠三角地区村集体资源来自集体农地的非农化使用，前提是乡村工业化且被纳入东部沿海城市经济带，成为城市经济带的内在部分。中国绝大多数其他农村地方显然没有这个条件。

成都市自 2008 年借建设城乡统筹改革试验区的机会，为每个村设立由市财政划拨的村庄公共服务资金，类似将国家资源转到村庄，形成虚拟集体资源，其运作值得重视。

四、成都试验：从“村公资金”到“社治资金”

2008 年，成都开始城乡统筹改革试验，其中一项是由市财政每年给每个村下拨 30 万—50 万元村庄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资金（以下简称“村公资金”），以达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目标。实现城乡均等基本公共服务目标，全国通行的做法是通过自上而下的项目，直接面对农户，建设农村公共服务项目。成都做法与之不同，它将大部分村庄公共服务资金打包到村庄，由村庄自主决定如何开展村庄公共服务。

从具体做法来看，成都市为“村公资金”使用制定了两个最为重要的规定：一是上级下发村庄公共服务建设项目目录，“村公资金”只能用于村庄公共服务目录范围内的公共事业建设。当然，这个目录上的项目比较广泛，弹性也比较大。最基本的一条，无论如何及无论通过何种方式都不能将“村公资金”分掉。

二是“村公资金”使用必须经由严格的村庄民主决策程序。成都市为此专门设立了“村民议事会”，由村民推选代表组成。村民议事会充分征求村民意见，又充分开展民主讨论，再决定如何使用“村公资金”，包括建设什么样的项目、如何建设等问题。村民议事会的决策权相当大，在全村村民高度关注下，由村民推选出来的村民议事会代表高度尽责，为自己所代表的群众争取最大利益，并高度关心项目建设质量效益。村民议事会讨论中充满各种激烈的争论，大家摆事实讲道理，说明情况，分析原因，激烈争论，充分协商，再形成共识。最为紧迫最为重要且投资相对较少的项目优先上，每年都有“村公资金”，后面的项目慢慢来。在由谁来建设项目、如何建设项目以及项目经费使用方式上，都有很大灵活性，村民议事会讨论最佳项目建设方案，对项目建设进行监管，为资金使用背书。因为村公服务项目大都是细小琐碎的，村民最了解自己的需求，村庄最清楚用什么方式来建设最有效益和效率，因此，各种不一定正规却十分有效的建设方案和实施办法，让较少的“村公资金”发挥了最大的建设作用。比如，由本村具有一技之长的农户来承建村庄小农水项目，可能花费2万元就可以达到由正规公司建设需要5万元甚至10万元的效果，且正规公司不会承接这类小项目。

很大灵活性，较大自主权，就为因地制宜提供了巨大空间，花小钱办大事，且每件事情都具有很强的针对性，都可以为村民带来看得见的便利，“村公资金”因此在很大程度上迅速改变了成都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短缺的现象。

灵活性和自主性也就意味着不够正规、不够规范以及对上级规定的变通执行。比如，村庄工匠承建工程不可能有正规发票，白条子无法入账，就可能通过村民议事会签字证明，或用其他不合规的方式解决。在村庄公共服务严重短缺时，村民高度关注“村公资金”使用，村民议事会也高度负责，虽然存在各种不规范和变通处理，但这些不规范与变通是为了因地制宜，既是必要的，又是有效的。问题是，既然不规范并可以变通执行，“村公资金”使用过程中就可能有人利用其中漏洞来达到个人目的，比如将工程承包给关系户、虚报冒领工程款等等。一旦发生这类违纪违规的事情，群众很快就可以知道，然后就向上级举报，上级下来查处，之前“村公资金”使用中的不规范就成为问题，白条子入账更是严重违反了国家财政资金的使用要求，就要整改。

成都市“村公资金”试验几年后，出现过几例在全市影响很大的村干部贪占挪用“村公资金”事件，以市纪委为代表的部门介入“村公资金”管理中，对“村公资金”使用提出了规范化要求，其中最重要的是，“村公资金”是国家财政资金，必须按国家财政资金使用要求进行管理。工程必须招标，不能再没有正规资质的施工单位搞建设。结果就是“村公资金”不好用了，使用效率和效益大幅度降低。比较好用的“村公资金”项目就是聘用保洁员、购买社会服务等相对固定的项目，“村公资金”由之前村集体可以自由灵活使用的“活钱”变成了可有可无的只能使用在固定项目上的“死钱”。既然已是“死钱”，村民也就不可能再关注钱如何用，村民议事会也无事可议。尽管如此，按之前的“村公资金”使用规范，“村公资金”的使用必须经由村民议事会讨论决定，因此，虽然村民议事会很少再实质性讨论项目（因为项目都是上级规定的可选余地不大的常规项目），却不得不走个形式，以让“村公资金”使用变得合规，“村公资金”就此变成鸡肋。

2017年成都市将“村公资金”改为社区治理资金（以下简称“社治资金”），“社治资金”也从之前由成都市统筹委管理改为由市委组织部下设的城乡社区发展治理委员会管理。“社治资金”与“村公资金”有两个大不同：一是“社治资金”主要用于社区治理创新，而非之前的村庄公共服务。社区治

理创新是个无底洞，一项社区治理创新可能需要数百上千万元，一年仅仅三五十万元额度显然是远远不够的。因此就有第二个大不同，有的区县将之前“村公资金”当年用不完可以节余下来下年再用的规定，改为“社治资金”当年用不完就要退回用作区县统筹。统筹资金被用于对社区治理创新重点项目的支持。更重要的在于，“社治资金”受到上级更多监管，更加被要求按财政资金使用规范进行严格管理。

这样一来，“社治资金”就与之前的“村公资金”有了本质的区别。“村公资金”某种意义上是集体的资源，集体有自由支配权，当年不用也可以节余下来留作以后再使用，“社治资金”则是明显的国家资源。成都将“村公资金”改为“社治资金”，也就将之前试图通过国家资源转移到村，激活村集体经济的改革，又改回国家资源下乡的老路（项目制）上了。

成都“公服资金”试验最大的失误是，当“村公资金”使用不规范，出现几例问题时，市纪委等部门按国家财政资金使用规范来规范“村公资金”的使用，财政资金使用的规范程序消灭了“村公资金”最为宝贵的能够激活村集体活力的灵活性与自主性。这种灵活性与自主性可以极大地提高“村公资金”（国家资源）的使用效率。相对说来，村干部的贪占挪用事件是极少数，且对“公服资金”的损害远少于“公服资金”发挥出来的作用。

成都市的做法如若是继续支持“村公资金”的灵活使用和自主使用，同时，加强资金使用的全过程监管，对于出现的贪占挪用，发现一例查处一例，严格查办，将村干部借“村公资金”来谋利的可能性下降到最低程度，则成都试验就可以为全国基层治理提供好的借鉴了。

五、通过国家资源激发乡村活力

当前全国绝大多数村集体都是空壳村，虽然国家一再强调发展集体经济，但缺少城市经济带的发展条件，一旦村庄进入市场经营中发展集体经济，可以预见的结果几乎都是负债累累。因此，当前村集体不负债就算是好村了。

仅仅不负债显然是不够的，村集体还要有资源，并因此建立起村集体与村民之间的强利益关联。如何建立这样一种强利益关联？一个办法就是学习成都“村公资金”经验，将国家直接为农民提供公共服务，变成国家为村集体提供相对固定的“公服资金”，然后由村集体通过民主的办法来内生供给农村公共物品。

当前国家通过项目制提供到村庄的转移支付，可以依据是否标准化和是否具有基础性分成四种类型，即标准化程度比较高的基本公共物品，如通村道路，基本养老保险；标准化程度比较低的基本公共物品，如农田水利；标准化程度比较高的非基本公共物品，如村庄垃圾分类，农业综合补贴；标准化程度比较低的非基本公共物品，如美丽乡村建设。

凡是标准化程度高的基本公共物品，因为标准化程度高，国家自上而下的供给就比较容易保证精准有效，又因为是基本公共物品，就需要由国家财政力量直接保证其公平性及保障性。除标准化程度比较高的基本公共物品以外的其他三类村庄公共物品，可以改变供给模式，从由国家直接通过项目供给改为国家以村庄为单位按人均固定额度，直接将资金划拨到村集体，由村集体通过民主程序来使用资金，内生供给村庄公共物品。

假定国家每年用于村庄层面的公共服务资源为1万亿元，其中用于标准化程度高的基本公共服务为7000亿元，其他三类公共服务资源就有3000亿元。按全国有6亿农村居民计算，平均到每个农村居民为500元；按一个村有1000人计算，每年就有50万元可以自由支配的村庄“公服资金”。用这笔资金，

就完全可能激活村庄集体活力，动员村民参与，将农民组织起来，建立起村庄的主体性。

具体地说，将国家资源转为村集体“公服资金”，然后用民主的方式通过自内而外、自下而上的组织，将村集体活力激活，就真正达到“国家资源下乡了，农民组织起来了”的目标。农民组织起来内生供给公共物品，最大的好处是防止国家资源供给偏差，提高资源转化为公共服务的效益与效率，同时，农民组织起来可以产生强有力的村庄公共性，抑制钉子户，建立一个有主体性的、村民积极参与的、村庄高度动员的基层社会。

国家直接为农民提供公共物品，结果就是在国家与农户之间缺少缓冲与中介，村级治理的主要工作就变成完成上级任务，迎接上级检查。一旦村集体成为村庄公共物品供给的重要一方，村级治理的重点势必转变为组织村民自治，村干部就必须深入到群众中去，了解群众需求，做群众工作，调动群众积极性，动员群众为建设美好生活而努力。

六、讨论与结论

“治理有效”是国家乡村振兴战略 20 字总要求的主要目标之一。当前农村基层治理中大量出现形式主义、治理内卷以及农民的客体化现象，这显然是基层治理低效的表现。

农村之所以会出现基层治理低效甚至无效，原因之一就是当前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主要依托于“国家-农户”的长循环，农村公共物品不分性质事无巨细地由国家通过项目制自上而下供给，农民在公共物品供给中失去了表达偏好与进行选择的权利。农村基层事务细小琐碎、高度复杂且往往具有很强的人格特征，虽然“国家-农户”长循环在为农村提供标准化程度高的基本公共服务方面具有优势，却不可能满足农村基层灵活、具体、多样的公共物品需求。基于“村社-农户”的短循环在调动农民参与主动性、形成群众主体性和满足村庄非标准化公共物品供给方面则具有显著优势，尤其重要的是，“村社-农户”短循环将村庄公共物品供给的决策者与受益人统一起来，从而可以激发农民的主人翁意识，农民从之前村级治理中的客体变成主体，因此可以形成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中的村庄动员机制：农民自发组织起来出钱出力建设自己的美好家园。

“村社-农户”短循环的关键是农户具有参与村庄公共物品供给的决策权。现在的问题是，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基本上依靠国家资源，村庄公共物品供给就必须按国家标准与规范进行，并且受到国家的检查、监管、审计，也就是进入了“国家-农户”长循环中。

“村社-农户”短循环的制度基础是村社集体所有制，即用于供给村庄公共物品的资源是村社集体的，而不是国家的，也不是个人的（个人资源需要经过一定程序变成集体资源）。当前中国村庄集体最重要的基础就是土地集体所有制，即农村土地所有权主体是村社集体，农户只有承包经营权。按道理，农户承包经营集体土地，应当向集体缴纳租金，以及向国家缴纳农业税。现在的问题是，2006 年国家已取消农业税及各种针对农民的收费，农民种地不再负担任何税费，因此，对于全国绝大多数农业地区来讲，村集体无法从土地集体所有权中获得集体资源。相对来讲，东部沿海已经实现工业化的发达地区农村，土地非农使用产生了巨额土地非农使用增值收益，集体因此有了巨额资源。不过，因为不同地区农村工业化进路不同，苏南和珠三角形成了具有显著地域特征的不同的集体资源类型，这两种集体资源类型并非传统的集体所有制。同时，广大的中西部地区农村难有类似工业化的可能，也就不可能通过农地非农使用增值收益来为“村社-农户”短循环提供资源条件。

成都由地方财政为村庄提供“村公资金”的做法，形成了通过国家向集体注资来激活集体活力的“村

社-农户”短循环。成都的做法相当有启发，它通过建立村民议事会，激发了村民的参与积极性。成都存在的问题是，虽然财政向村庄注资了，但这笔资金却仍然是国家财政资源，并没有真正变成村庄集体资源，所以，财政注入资金如何使用要受到上级严格监管，上级部门必须为资金使用承担责任。就是说，成都“公服资金”自始至终都是国家资源而非集体资源。正是因为这一点，当成都“公服资金”使用出现问题时，国家即改“公服资金”为“社治资金”，这样一来，之前在村庄公共物品供给中起到决定性作用的村民议事会，成为国家财政资金在村庄使用的“橡皮图章”和一个程序，“村社-农户”短循环再次变为“国家-农户”长循环。

因此，以村庄为单位，按居民人数进行国家资源的定额划拨，划拨下来的资源完全按集体资源对待，才能为“村社-农户”短循环提供资源基础。因为按居民人数进行拨款，如何确定村庄居民人数，或如何确定村社集体成员，就会成为重要问题。通过对集体成员权的确定，可以激发村民强烈的参与意志，激活村集体体制。

通过将部分国家资源划拨到村社集体，按照集体体制使用国家划拨到村社的资源，将国家资源变成集体资源，国家不再只是代替农民为他们做好事，国家资源下乡也就不再是慈善事业，而是通过资源下乡激活村集体，动员村民参与到自己建设自己美好生活的事业中来。将村庄公共物品供给中“国家-农户”的长循环转变为“村社-农户”的短循环。在村社建立群众对自己生活负责的体制，他们有主动性，有主体性，这样的治理才能有效，这样的建设才可持续。一个有主体性的积极的基层社会，就有能力对接国家资源，就可以真正将资源下乡变成治理有效。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一旦将国家资源下拨到村社集体，国家资源的性质就变成了集体资源，就应当按集体资源进行管理和使用，就应当有远不同于国家资源的管理方式和使用灵活性。唯如此，才可以真正建立与农民强烈的利益相关性，调动农民参与的积极性，重建村社集体主体性。

总之，国家资源下乡为基层体制注入活力，才可以实现基层的治理有效。

（作者：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来源：《学海》2024年第2期）

农村改革中的华国锋

赵树凯

华国锋从调入中央分管农业到担任最高领导共 10 年，其中主政之前六年，主政之后四年。主政之前，主要分管农业，参与了文革中后期所有农业重大决策；主政之后，高度重视农业，对农业倾注了相当多精力，提出了若干主张和工作举措。研究中国农村改革史，华国锋研究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

在华国锋主政四年间，农村改革艰难起步并取得初步突破。但是，迄今为止的农村改革史研究，华国锋研究是明显“薄弱环节”：有“盲区”，主要是缺少关于华国锋的专门研究，也有“迷思”，主要是把华国锋的作用标签化、简单化，甚至作为改革叙事的背景来处理。

1971 年 3 月，华国锋调到中央，接替纪登奎分管农业、财贸和国务院办公厅。此时，纪登奎工作重点转向党务，但在重要场合仍然参加领导农业，因为已进入政治局，位置在华国锋之上。华国锋当时还担任湖南省委第一书记，有时回湖南，通常由纪登奎接替管农业。华国锋与纪登奎共同管农业，持续到 1976 年初华国锋担任国务院总理，纪登奎以常务副总理重新管农业。1973 年秋天，陈永贵进入政治局，后来担任副总理，也参与农业领导，但角色比较特殊，主要是宣扬大寨经验、象征性公开讲话。

华国锋初到中央，马上参与主持国务院召开的棉油糖会议，面对棉油糖生产十年徘徊局面，主持研究提高收购价格、增加棉农化肥和布票补贴。五月起，华国锋到南方八省做了两个月农村调研。调研过程中，纠正了南方有的省以“水稻为纲”的做法，提出应该允许农民种植其他粮食和经济作物。随后，主持制定了两个农业文件：一个是中央关于粮食征购任务“一定五年”的通知，强调防止收购“过头粮”，提高农民生产积极性；一个是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分配问题的指示，强调增加农户分配、实现按劳分配、整治干部超支等问题。这些政策调整对提高农民积极性、抑制不断强化的左倾政策有明显作用。

在八省调研后，华国锋曾向毛泽东当面汇报，毛泽东说：“你满脑子是农业，我满脑子是路线斗争”。华国锋高度重视农业生产技术，在湖南时就支持袁隆平杂交水稻试验，把杂交水稻作为全省重点研究项目到中央以后，亲自安排，给袁隆平更大支持。华国锋还亲自扶持了山东农民李登海的玉米种子试验。袁隆平的杂交水稻种子和李东海的玉米种子对后来农业增产影响较大。

1971 年 8 月，华国锋主持召开全国农业机械化工作会议，强调要发挥“条条”和“块块”两个积极性，“一家包打天下是不行的”；强调重视发展地方“五小”工业（小钢铁、小机械、小化肥、小煤窑和小水泥厂），对文革中的社队企业发展有重要推动。

1973 年 6 月，华国锋主持召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强调要做过细的工作”，主持制定了提高知青安置费标准、口粮标准等新政策。这次会议长达一个多月，讨论的政策相当细致，包括要给下乡知青木材盖房子，要保证女知青每月有两天休息时间。当时最突出的问题是女知青受到基层干部性侵，周恩来华国锋等中央领导非常重视。会议期间广东省汇报，发生强奸女知青案 458 起，枪毙基层干

部 5 人。华国锋主持成立了国务院知识青年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国家农林部。

1974 年 12 月，华国锋发出《关于社队企业问题给湖南省委一封信》，热情肯定了公社、生产大队办企业的经验。信中尖锐批评了社队企业的反对者：“他们不但不支持热情的群众，反而向群众的头上泼冷水。他们瞧不起社队企业这株幼苗会茁壮成长起来，看不到那许多巨大的优越性，总是在那里横挑鼻子，竖挑眼，指责这也不像“样”，那也不“正规”，以种种理由妄图取消或者吹掉社队企业，搞成“清水衙门”，就“正规化”了，他就痛快了。我们劝这样的同志不要重复叶公好龙那个故事，讲了多少年的社会主义，临到社会主义跑来找他，他又害怕起来了。要坚决丢掉这些错误思想，满腔热情地支持这一新生事物。”华国锋这封信和随后工作部署，对于后来社队企业的发展有重要促进作用。社队企业后来更名为乡镇企业，乡镇企业改制后大部分成为个体、私营和股份制企业，是民营经济的重要渊源。

1975 年 8 月，华国锋主持修改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文件，删去了前期陈永贵主张写进文稿的“大寨经验”：自留地收归集体、农民住房收归公有、生产队核算改为大队核算、实行“政治工分”，指示在会议文件材料中这些做法“都不要提”。他特别强调：“不能搞政治评分，要按照劳动的数量和质量计算报酬。”华国锋还主张提高农民的口粮标准，明确表示口粮中还要包括饲料粮，“不要写不超过 600 斤”。1975 年春起，全国掀起学习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运动，一些地方农村出现了划分“新生资产阶级分子”的做法，华国锋主持农业学大寨会议筹备工作时明确指示：“关于新生资产阶级分子，界限划不清。农村不划新生资产阶级分子，是什么分子就是什么分子，贪污分子就是贪污分子，投机倒把分子就是投机倒把分子。新资产阶级分子一定有，但在处理上不划，理论上可以讲。”华国锋这个表态，制止了农村中划出新一类阶级敌人的做法，否则，在当时的情况下，农村会在地主、富农之外出现一种新的阶级成分，即“新生资产阶级分子”。针对当时批判农民“自发资本主义倾向”问题，特别是很多地方把农村老太太养鸡都算作资本主义倾向进行打击，华国锋指示：“不要搞人人过关，不打击是主要的”，“不要把矛头指向老太太。属于广大群众中的大量的问题，不要一个一个都批判。”华国锋对这次会议文件起草的把关，对文革中“左上加左”的政策倾向有明显抑制作用。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整个文革期间，农村政策的纲领和前提，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是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出发，部署各项农村工作。从当时中央领导层来看，在“阶级斗争为纲”框架之下，具体的政策意见实际上有两个倾向，一种以张春桥、陈永贵等为代表，坚持公社化初期的政策理念，认为公有化水平越高、规模越大才体现社会主义，且有相当一部分领导人支持；一种以纪登奎、华国锋为代表，坚持 1962 年制定的人民公社六十条的政策思路，允许给予农民适当经济自由。华国锋能够比较多为农民和农业生产考虑，坚持维护 60 条中农民的经济自由权，政策主张相对务实，成为激进化政策潮流中的稳健力量。

华国锋主政两个月后，1976 年 12 月，提议并主持召开了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参加会议者有县委书记以上领导干部五千人。这是华国锋主政后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性的会议，虽然会议名义是农业学大寨，但核心主题是揭批四人帮，批判四人帮“只抓革命，不促生产”、“批唯生产力论”。这个会议虽然继续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但实际效果虚化了“阶级斗争为纲”，强调了“坚持党在农村的经济政策问题”，强调农业生产，一定程度上标志着工作重心实际性转移。这次会议在农村工作中有政治转折作用，在农村改革史上有重要地位，但已有研究重视不够。

1977年11月，华国锋主持调整了农林部班子，亲自主持农林部领导班子座谈会，以生产为核心议题，向农林部提出了新的工作要求。当时的国家农林部是中央农村工作综合部门，华国锋的这些部署推动了农村工作转向生产为重心。

1978年8月，华国锋从南斯拉夫考察回来，亲自主持召开“人民公社、国营农场试办农工商联合企业座谈会”。他从南斯拉夫受到启发，认为人民公社要进行体制改革，不仅要从事农业生产，而且还要从事农产品的加工和流通，实行农工商联合经营，没有加工和流通，人民公社就搞不上去，农业就只能是“殖民地”。在座谈会上，很多农口部门和地方负责人不同意，时任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提出四川省可以开展农工商一体化试验，并安排邛崃、广汉、新都三个县试点。人民公社政社分设后，经济组织普遍改为“农工商总公司”，四川广汉率先撤销“人民公社”牌子，出现了全国第一个乡政府。农工商综合经营，是华国锋倡导推动的一次人民公社体制重要突破，对随后农村基层组织体制改革、农村工业化发展有重要影响。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讨论了两个农业文件，是加快农业发展的决定和人民公社六十条修改草案。这两个文件，是在华国锋的领导下，由国务院常务副总理纪登奎主持起草。两个文件稿在会议讨论中争议较大，后来作出重要修改后原则通过。从当时中央领导层的基本政策态度来看，在维持人民公社体制、反对家庭经营方面有高度共识，也就是说，没有任何一位中央领导人当时已经意识到需要冲破人民公社体制，重建家庭经营，只有个别地方领导人对人民公社体制产生了根本性怀疑。突破发生在地方，主要是四川、安徽等。

1979年3月，国家农委召开七省三县农村工作座谈会。会议后期，华国锋听取汇报并讲话。这次会议发生了包产到组问题的争论。华国锋的基本政策态度是：赞成加强责任制，但是不赞成包产到组。他讲话强调：总的要发挥集体经济优越性，要提倡定额管理，加强责任制，究竟怎样搞得好的，不要一刀切。”谈到包产到户时，他说：“有的大山区，单门独户，开了点地，你想要他下山，造成很大浪费，可以包产到户。给他点肥料，统一在集体经济里，参加分配，使他有一点好处。但是就大多数地方来看，不能包产到户。”1980年1月，国家农委召开全国农村人民公社经营管理会议，31日，华国锋听取会议汇报，政策态度没有明显变化：“责任制和包产到户、单干不要混同起来。”

华国锋还主张成立农民协会，他认为，在地主富农摘帽之后，原有的“贫下中农协会”已经不适应，但仍然有必要建立全国性农民组织。1979年9月十一届四中全会期间，副总理王任重曾经根据华国锋要求，召集部分与会中央委员征求成立农民协会的意见。12月，农委第一副主任张平化在天津召开农民协会问题座谈会。1980年1月初，国家农委向中央提交了筹备成立农民协会的报告。时任中央秘书长胡耀邦将报告转呈送邓小平审批。3月22日，邓小平批示：“此件压在我处，始终徘徊，未加处理，现在，我倾向不再设贫协，至少一二年内不考虑”。3月26日，万里秘书将邓小平批示传达到国家农委，正在推进中的农民协会筹备工作随即终止。

从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自1980年1月31日之后，即华国锋、邓小平、李先念、胡耀邦等人听取国家农委汇报并讲话之后，华国锋再没有关于农村政策问题的讲话或批示。其中原因难知其详，可能与1980年2月中央书记处成立、高层权力发生结构性改变有关。中央书记处成立之后，胡耀邦担任总书记，中央书记处成为党中央日常决策机构，作为党中央主席的华国锋，许多决策已经不再参与。九月，中央召开各省第一书记会议，专门讨论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主要是胡耀邦、万里等主持，华国锋没有

参加，也未见表态。十二月，在政治局会议连续受到批评之后，华国锋表示辞职。半年后，1981年6月，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中，华国锋辞职正式确认并昭告天下。

与同时期、同资历其他领导人相比，华国锋的特点是，了解农村情况，熟悉农村政策。华国锋谈农村政策方方面面，谈人民公社内部管理，甚至农业生产各种活动，都详细具体。他的领导工作作风内敛温和，无论是处理一般工作问题，还是处理政策问题上的不同意见，都包容宽厚。不论主持高层会议内部讨论，还是主持农业部门会议，甚至主持起草修改文件，作风平易，态度温和，不盛气凌人。不像有些领导人那样，在内部会议上往往出言不雅，甚至爆粗口。

评价华国锋并不容易，也并非本文任务。研究华国锋，重要的首先不是如何评价，是从高层政治深处开发、重建历史事实，而不是像很多已有著述那样，依据特定叙事框架给以“背景化”、“标签化”处理。虽然八十年代刚刚开始华国锋就离开了政治舞台，但是，要研究活力迸发、别开生面、与传统中国政治大异其趣、在漫长历史上难得一显的八十年代政治和改革，华国锋研究不可或缺、至关重要。农村改革是政治大转折所意外生成，如同杜润生所言，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农村改革史研究，需要更多宏观政治关照，而不能局限于特定经济政策。

讨论农村改革的发生，也许需要有多重视角，其中最值得重视的是，宏观政治条件、政治环境的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讲，毛泽东时代结束，华国锋主政之初，农村改革就开始起步。具体看，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召开，安徽、四川省委自主性政策调整突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都可以视为农村改革展开的转折点。对改革史的学术研究而言，不仅改革起点，而且进程和机制，研究视角都要不断拓展。随着研究深化，农村改革史将发生图像再造和叙事重构。

（作者：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2024年6月2日）

基层的“痛苦”：监督越紧，违规越多

田先红

我们在某地调研时发现，由于县乡政府本身缺乏维持运转和提供公共服务的常规资金，而各种项目资金又要求专款专用，因此县乡政府不得不整合甚至挪用项目资金。这种行为违背项目资金的使用规定。绝大多数干部并没有将项目资金据为己有，而是用于公共目的。该行为的产生确实有体制原因。如果监督部门放任不管，可能导致项目资金被挪用的现象更为严重，但若真要追究起来，县乡干部也有冤屈，可能会挫伤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放任不管不行，监督过严也不可行，便形成了所谓监督悖论。

一、监督悖论的根源

基层干部违规行为的产生，有其体制根源。

一是财政体制的问题。在县域，不少单位都是差额财政拨款单位。上级只为这些单位提供一部分预算资金，不足部分需要单位自筹。比如，在年终奖发放上，上级只为乡镇、部门提供发放年终奖的权力（机会），但是干部年终奖的资金要由乡镇、部门自筹。如果乡镇、部门无法筹集到资金，即使获准发放年终奖，实际上也无钱可发。乡镇领导的权威受损，干部们的工作积极性也被挫伤。因此，乡镇主要领导面临着巨大的资金筹集压力。M镇镇长说：“我跟书记两个人，一睁眼，就想怎么找钱。”（访谈笔记）不过，让人疑惑的是，尽管各乡镇、部门多多少少都存在资金缺口，有的缺口还非常大，乡镇领导也经常抱怨不好筹钱，筹钱的压力很大，但最后似乎所有的缺口都补上了。问题的关键就在于，乡镇、部门是如何填补这些资金缺口的？

二是项目体制的问题。项目制是一种理性化的制度设计。它追求治理目标的合理化，通过严密的流程、制度来实现资金投放目标。贫困县具有整合涉农项目资金的权限，但是整合的权限、边界不明确，这导致允许整合的项目资金被整合，不宜整合的项目资金也被整合。此外，有些项目的设计确实与基层社会实际不符，如果严格按照上级的项目规划标准，则项目无法落地实施。县乡政府不得不变更项目计划，将项目资金用于其他地方，这实质上构成了挪用项目资金的行为。在常规财政资金不足的情况下，乡镇要自主发展，自寻出路，自己想办法筹钱。如果乡镇不设法筹钱，就无法满足基本需求（包括发放年终奖），更谈不上发展、出政绩了。但是，无论是出于晋升还是其他因素，乡镇领导普遍有打造政绩的动力。要出政绩，要发展，就缺资金。在不允许借债的条件下，乡镇要解决资金问题，要么“吃项目”，要么自己想办法筹集资金。为确保资金链不断裂，乡镇一般采取以下策略。

一是向上级争取工作经费。二是向上级争取项目资金。三是拆东墙补西墙。

如此，乡镇才能够维持运转。

这些违规行为普遍存在，被上级默许。在县域基层，这些行为具有一定的合法性。基层政府和干部有时会突破财政管理制度的约束。当然，基层干部也必须把握底线，诸如救灾、扶贫、低保、五保的资

金是红线，基层干部一般不敢触碰。

总之，一方面，上级期待乡镇干部做事情、出政绩。乡镇干部要出政绩，就要发展，要发展就必须要有超出上级转移支付的额外资金。另一方面，上级转移支付的资金只能满足乡镇保运转的需求，项目资金跟基层社会实际不符的情况确实存在。当挪用项目资金成为大家的一种默契时，它便成为一种潜规则。违规行为的存在，为日后问责埋下了风险。

二、弹性问责：违规行为的有限监督

财政项目资金都规定了特定用途。只要基层政府整合、挪用，那么审计部门应该不难发现违规行为。尤其是随着财政制度规范化的增强，这些违规行为较容易被发现。对于这些违规行为，上级的基本态度是，审计但不追究。如果审计部门不进行财务审计，就是渎职、失职。审计之后是否处理，则是上级党委政府和纪检监察等部门的职责。上级纪检监察部门也面临两难抉择：如果全部介入调查处理，那么打击面太大，且不合情理；如果放任不管，那么违规行为可能愈演愈烈，并损及法律制度的权威。所以，上级纪检监察部门一般采取弹性问责的策略，会调查处理部分违规行为，但并不覆盖所有的违规行为。

上级一般把握四条底线：一是违规行为的性质不是太严重，没有产生太大的影响，上级没有明令要求调查处理；二是违规整合、挪用的资金被用于公共目的，基层干部没有将资金据为己有；三是违规行为没有触碰红线，没有整合、挪用明令禁止整合的专项资金；四是不告不理，即只要没有人举报，一般不会进行调查。

因此，上级进行审计时，即使发现了这些违规行为，也可能因为法不责众而不得不作罢。上级也很清楚，这些违规行为很大程度上是基层体制导致的，是基层干部在既定的制度环境下形成的一种默契。这些灰色地带的存在也为基层干部提供了灵活操作的空间，使基层政府在常规财政资金紧缺的情况下也能继续运转、发展，进而出政绩。如果纪检监察部门对这些违规行为一律查处，基层干部既缺乏常规财政资金，又无法从其他渠道获得资金支持，那么很可能催生消极怠工行为。在这些违规行为已成默契的情况下，对基层干部追责也容易让他们“寒了心”，进一步强化他们“不干没错，干得多错得多”的认知。

最终，纪检监察部门只能对这些违规行为采取有限监督的策略。上级明令要求查处、性质严重的违规行为，纪检监察部门必须介入调查，并对有关责任人问责。有的即使被查处问责，上级也可能“高高举起，轻轻放下”。其他一般的违规行为，上级则采取默认的态度。

但基层干部仍然普遍表示出担忧。纪检监督的强化、问责的泛化，增加了基层干部的不安全感。基层干部担心这些违规行为会成为日后的隐患。一旦未来发生变故，曾经的违规行为就成了把柄。毕竟，违规是铁的事实。只要被揭发，涉事的基层干部就难辞其咎。

三、走出监督悖论的重心放在哪里

在违规行为成为一种默契的情况下，如果监督过严，易造成打击面太宽，挫伤基层干部的积极性；如果放任不管，则违规行为加剧，并损及法律制度的权威，监督悖论由此形成。

要走出监督悖论，在加强监督、强化法律制度权威的同时，根本出路在于进一步理顺基层体制。国家近年来不断加大对基层干部的监督力度。通过各种制度建设、技术手段强化对基层干部的监控。但是，在基层体制未能理顺、乡镇必须寻求制度外财力来源的情况下，基层的各种违规行为就不可避免。由于乡镇同时面临着发展和财政的双重压力，它们不得不设法甚至违规去寻求各种资源。在乡镇基本需求无

法被满足的情况下，越限制、监督，就越倒逼乡镇去寻求额外的资源。上级强化对基层干部的问责，可能因为法不责众而不了了之，有损法律制度的权威，还会使基层干部人人自危，不敢干事创业，进而导致基层干部避责行为的蔓延。

监督的初衷是促进基层政府行为合规。

当前，自上而下的监督体系不断完善，但是基层的制度体系没有理顺，结构性地导致了一些不规范行为。对于这些不规范行为，基层政府已经形成了一套共识（潜规则）。在监督强化的环境下，不规范行为的风险日益增加。由此造成的局面是：一方面，基层体制不断催生不规范行为；另一方面，对基层干部不规范行为的监督问责在不断强化。上级如果将重心放在问责基层干部上，可能会掩盖基层体制/制度体系本身的问题。

因此，基层治理现代化转型应该以合理化的制度体系建设为基础，采取疏堵结合的方式，既要监督问责，又要理顺基层体制机制，使基层干部真正拥有干事创业的资源 and 空间，而监督又更加卓有成效。未来国家的重点应该放在怎样进一步改进财政转移支付制度、项目资金配置和使用制度等方面，使财政资源分配更为合理，为基层提供更为充裕的常规财政资金。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笔者无意为基层干部的违规行为辩护。实际上，基层干部的某些违规行为确实包含主观因素，需要受到严厉监管和惩处。本文主要分析的是由于基层体制未能理顺而导致的违规行为，阐明这一违规行为形成的具体机制，并指出解决这一问题的重点方向所在。

（作者：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来源：节选自《韧性：县乡政府如何运行》）

量子纠缠与老年养生

辛秋水

因为（量子纠缠）的真实存在，今后请您只想高兴的事！

简直太可怕了，以后千万不要再想那些不好的事情了。第六感，心灵感应，心念，灵魂，吸引力法则，等等等等，这些东西，竟然真的存在。去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颁发给了量子纠缠，就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科技的进步，不但颠覆了我们的认知，还极有可能在现实中，操作大脑中的虚幻世界。他证明了心想真的会事成，命运真的是由心造。人真的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如果你在心理上，坚信自己很健康很顺利，身体大概率也会作出相应的配合。你的人生也会越来越顺利。如果你整天愁眉苦脸想不开，那么大概率也会出现身心问题，人生也会不断的遭遇坎坷。过去，大家都有体验，很多时候，我们都是跌，我正怕什么来什么。一件事越往坏处想，真的就有可能越来越糟糕。如果你整天想那些倒霉的事儿，那么你遇到的事，肯定也好不到哪里去。所以千万不要小看一个小小的念头，他真的会产生非常巨大的能量。有的人得了不治之症，非常害怕，不久吓就吓死了；而有的人得了同样的病，却根本没往心里去，结果却活了很多年，甚至还完全痊愈了。这不就是信念的力量吗？所以在现实当中，如果你的人生不顺利，身体不舒服，千万不要心灰意冷，千万不要悲观，也不要告诉任何人。别人问你的时候，你永远只需要回答：[很好]，就可以了。千万不要到处跟人喋喋不休的讲你家里那些糟糕的事，更不要去抱怨，那样的话，你自身周围只能积蓄越来越多的负能量。只要你拥有积极乐观的心态，你就完全可以扭转人生的命运。唯心所现，唯识所变，世间万法皆由心所生，你的心中藏着什么，你就会收获到什么。心念本身就是一种不可思议的能量，积极向上的心念，一定会让你的生活变得事事顺遂；反之，如果多疑、嗔恨、忧虑等等，负面的能量过重，则一定会损耗你的好运的。所以我们要共同营造强大的正能量氛围。

俄国著名生理学家巴甫洛夫说：“快乐是养生的唯一秘诀”。快乐与健康是天然相连的，进入老年后如何让自己更快乐呢？

1. 如果你已经 70-90 岁了，就该明白：你早已经不是超人，不要整日疲于奔命，应该活得从容。比如饭应一口一口吃，事要一点一点做。光从容还是不够的，适当的时候还是要秀一下自己，让平淡的日子亮起来。

2. 如果你已经 70-90 岁了，就该明白：生活质量的优劣，完全取决于自己的心态。天天海参鲍鱼大鱼大肉、山珍海味，上五星级高级餐厅，不见得就是生活质量高。只有获得精神上的满足，才是质量生活。

3. 如果你已经 70-90 岁了，就该明白：亲情的疏离是切肤的伤痛。淡一些、谅一些、忍一些，会使我们的心宽一些、和一些、暖一些。

4. 如果你已经 70-90 岁了，就该明白：选择朋友很重要。和乐观、志同道合的人交朋友，你也会变得乐观开朗。

5. 如果你已经 70-90 岁了，就该明白：学习还是很有必要的。活到老，学到老。关注与自己职业和爱好相关的新知识。大胆尝试感兴趣的事，如微信、电邮、网购……。不要怕学不会、烦。

6. 如果你已经 70-90 岁了，就该明白：靠谁都不如靠自己。有些问题是需要自己去解决的。要相信自己，直面挑战，视困境为机遇，学会创造性地解决问题。

7. 如果你已经 70-90 岁了，就该明白：地位和荣誉只不过是一个杯子，而您的修养和品性才是你杯中的东西。夜光杯中未必盛的就是葡萄美酒，也可能是一杯浊水。粗瓷盏里未见得就是白开水，很可能闷的是一盏极品龙井。

8. 如果你已经 70-90 岁了，就该明白：心存感恩的人过得更快乐。对于任何祝福，无论大小都应懂得感恩。拥有的家庭、工作和朋友，都应知道感激，不妨亲口告诉他们，生活中因为有了他们，你才感到快乐。

9. 如果你已经 70-90 岁了，就该明白：笑一笑十年少，笑口常开没烦恼。对自己对生活都不要过分严肃。试着发现身边的点滴乐趣，适时地幽默一下，让生活充满笑声。

10. 如果你已经 70-90 岁了，就该明白：有个照顾你的人，是最大的幸福，没有照顾你的人，就自己照顾自己。要保证休息、运动和健康饮食，经常以有趣、刺激的方式练习大脑，活跃思维。千万不要去管那些不该管也管不了的国家大事，当了愤老还自以为是匹夫有责。弄得自己烦恼不已、牢骚满腹。影响情绪。

记得发给更多 70-90 岁的亲友们~

（作者：原安徽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2024 年 5 月 24 日）

充分开发利用盐碱地

张蓝水

【摘要】：盐碱地是使农民发愁的一种土地，因为土壤表层盐类、碱类累积，致使农作物在其中的正常生长受到阻碍，不能充分发挥其在适宜土壤中生长的原有产量和质量性能，使农业生产受到巨大损害。联合国粮农组织调查，全球有近 10 亿公顷盐碱地不能被有效利用。我国有 15 亿亩盐碱地，占全球 1/10，其中 5 亿亩有可利用潜能。我国科学家采用物理、化学、生物及选育、育种等基础科学研究，特别是近年兴起的基因编辑技术，使有可利用潜能盐碱地地区广大农民看到盐碱地恢复生机的光明前景。

【关键词】：基因编辑技术 农业经济学 盐碱地 农业现代化

《北京日报》今年 4 月 12 日“新知周刊”几乎整板刊发《中国科学家找到作物主效耐碱基因盐碱地有望告别“十年九不收”》一文。看到大标题就使人兴奋不已，我们一直揪心的我国农业耕地少之国情，有望在抗击耕地盐碱化过程中，增强农业生产能力。

我国 18 亿亩耕地“红线”一般认为肯定不包括盐碱地。但要严防有的“红线”耕地出现因盐碱化而减产、减质趋势。如果“红线”地外有可利用潜能的盐碱地能种植农作物，无疑相当增加了“红线”地外的农业实际耕地面积。这对中国农业则是一大德政。因此，科学家研究盐碱地的农业利用，就是在耕地资源少的国情下保持农业生产能力，增强农业保供担当，惠及我国 14 亿国人的伟大工程。

一、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粮农组织发布的数据，全球盐碱地总面积为 9.5438 亿公顷，其中盐地：碱地=4：6。我国盐碱地有大约 1 亿公顷即 15 亿亩，占世界盐碱地 1/10，有可利用潜能的盐碱地为 5 亿亩。

农业界普遍认为，盐碱地不是可种植农作物的一种“地”。盐碱地的成因，是因地下水位升高，土壤层矿化度增强，加上气候干旱和蒸发强烈，导致深层土内盐分随水分蒸发向表层土迁移，表层土盐化或碱化程度加重的现象。广义上的盐碱土是人们对盐土和碱土的统称。盐土指受中性钠盐（主要是氯化钠和硫酸钠）影响的土壤。碱土是指受碱性钠盐（主要是碳酸钠和碳酸氢钠）影响的土壤。我国大部分农作物适宜种植在含盐量 0.3%以下，PH 值（酸碱度）在 5.5-7.5 的偏酸性土壤中。化学概念的“盐”，简单说是金属离子与非金属离子的化合物。生活中吃的盐是化学“盐”中的氯化钠。农业俗称的地之“盐碱”，实际都是化学概念的“盐”。

盐碱地影响农作物正常生长的机理有两方面。一是高浓度盐分环境，会提高土壤溶液的渗透压，即盐分容易向植物内渗透，植物之淡水外渗，导致植物死亡。二是土壤中钠离子含量及 PH 值过高，抑制植物对钾、磷、铁等营养元素的吸收，出现“营养不良”，危害植物正常生长和结实。另外，PH 值高

影响微生物活动，导致土壤肥力下降。

为使盐碱地适宜农作物生长，我国农业领域采取的办法现主要有三种途径。

一是减少盐碱量及对农作物危害。为此，在实际生产中常常采用三方面改良措施：1. 物理改良措施。轻者采取地表覆盖、减少蒸发，及采取耕作措施，改善土壤结构，增强土壤渗透性。重者采取工程措施，深挖排水沟，利用地下水的自渗和淋洗土层，降低土壤层的盐碱度。一般排盐碱沟渠，通常开挖深度有2米左右，甚至更深。形成工程量大，施工成本高，发挥效益迟，还占用了耕地。这是农民生产力水平低下条件下，农民采取的一种“人海战术”，应该说是初期一种比较原始的治理盐碱地方法。冬闲季节，动员农民挖渠，除了用来引水灌溉大渠，就是这种用来排除盐碱的大渠。2. 化学改良措施。轻者向土壤加入降低土壤PH值的化学物质，如不同类型的石膏、腐殖酸、糠醛渣等物质，改善土壤结构。重度盐碱地会采取综合施策，化学改良与其他改良措施相结合，避免破坏生态环境。3. 生物改良措施。对盐碱地有针对性引种吸纳盐碱的植物，收获后清出该地块，可减少土壤的盐碱成分，以改善土壤物理化学性质，符合保护生态环境的基本方针，是一种见效缓慢的局部措施。

二是选育耐盐碱的农作物新品种。前些年，在袁隆平院士支持下，以山东省农业科学家为主体，选育、培育出一种水稻新品种，取名“海水稻”。但并非是给稻田浇灌海水，而是在较低盐碱含量土壤生长的水稻，适宜在沿海滩涂盐碱度较低的土地种植生长。据说稻米呈胭脂色，微量元素胜过普通稻米，适口性被认可。按理说，对此类水稻应称为“耐盐碱稻”。他们之所以定名“海水稻”，觉得通俗易懂，便于向农民宣传、推荐。除沿海滩涂外，包括新疆塔克拉玛干在内，现在已有大面积推广种植。据网上反映，2022年种植面积突破100万亩，获得显著效果。

今年5月22日《人民日报》报道河北省沧州黄骅市农户种植农业科研部门选育的旱碱麦良种在盐碱地里造出新粮仓！位于沧州市的中科院南皮生态农业试验站，主要承担盐碱地改良利用，耐盐碱小麦品种选育研究。当地地下水矿化度高，又不宜灌溉，土壤中有机质含量低，特殊的耕作环境，要求小麦耐盐碱、更抗旱。他们筛选的耐盐碱、高产量的“旱碱麦”品种，在位于黄骅的河北省旱碱麦标准化示范区大面积种植。

黄骅临海，耕地多有盐碱，过去农民种小麦亩收仅50公斤。如今农民种植科研部门筛选的旱碱麦，全黄骅已达60万亩，小麦总产达13.26万吨。黄骅农民的实践表明，提高土壤有机质和采取适宜当地降水条件的微沟播种技术，有利于旱碱麦抗盐碱增产。2022年，黄骅农业取得亩均220公斤小麦令农民称道的骄人业绩。《黄骅旱碱麦生产技术规程》已作为河北省级地方标准。河北省的旱碱麦远走天津市滨海新区和山东省滨州等地滨海潮土区域种植。

三是研究农作物耐盐碱基因技术。我国治理盐碱地的理念已从“治理盐碱地适应植物”向“选育耐盐碱植物适应盐碱地”转变。

二、前不久，中国科学家关于“首次发现主效耐碱基因AT1”的研究发表在世界顶级学术期刊《科学》杂志上，引起广泛关注。杂志审稿人高度评价为“科学界的重大发现”“农业生产方面的重大突破”。这项研究由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谢旗团队、中国农业大学于菲菲团队与华中农业大学欧阳亦聘团队联合多家科研机构、高校、企业协同攻关，以耐盐碱作物高粱为材料，首次发现主效耐碱基因AT1及其作用机制。

中国科学家们选择耐盐碱较强的农作物高粱作为研究对象，采用基因编辑技术，将其AT1基因“剪

切”（摘除）后，其耐盐碱能力增强。他们认为，AT1“在高粱碱胁迫的响应过程中起负调控作用”，也就是说，缺失了AT1这个基因的高粱更耐碱。研究团队科学家以高粱为对照，进一步追索主要禾本科农作物水稻、玉米和谷子的耐盐碱基因。发现它们有雷同于高粱AT1的基因GS3，缺失了GS3基因的水稻也更耐碱。这意味着，这个机制在水稻、玉米等禾本科农作物中是通用的，“这是基础科学的重大发现。”

团队在宁夏平罗盐碱地（PH值为9.10）的大田试验：“剪切”AT1的高粱籽粒收获量增加20.1%，青贮用全株生物量增加近30.5%。“剪切”GS3的谷子增产近19.5%。PH值为9.17的吉林大安盐碱地，基因编辑的水稻增产22.4%-27.8%。团队发现基因编辑的玉米增强了在盐碱地的存活率。

植物耐盐碱性研究是个重大科学问题。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到黄河三角洲农业区考察调研，了解盐碱地生态保护和综合利用、耐盐碱植物育种和推广情况，指出：“18亿亩耕地红线要守住，5亿亩盐碱地也要充分开发利用。如果耐盐碱作物发展起来，对保障中国粮仓、中国饭碗将起到重要作用。”我国粮食主产区主要集中在黄淮海平原、长江流域、辽河流域、西南地区、西北地区。我国盐碱地大多分布在东北、华北、西北及滨海地区，与粮食主产区高度重合。盐碱地是我国重要的耕地后备资源，适应盐碱状况的作物培育和盐碱地综合治理是确保18亿亩耕地红线的根本保障。

依靠基因编辑技术，发现AT1/GS3对禾本科农作物耐盐碱的负调控作用，是我国科学家对世界农业育种的重大贡献。农业科学家预计，如果全球有20%的盐碱地实施这个基因编辑技术，可为全球增产2.5亿吨粮食，就将明显提升盐碱地对人类的贡献，提前实现2030年世界脱贫的目标。

三、相信18亿亩“红线”耕地，都是优良农业用地，除了10亿亩稳产高产农田外，8亿亩中保不齐会有盐碱化倾向，加上那5亿亩有可利用潜能的盐碱地，我国农业始终面临着土壤盐碱化的威胁，随时与盐碱化斗争这根“弦”不能放松。采取“治理盐碱地适应农作物”与“选育耐盐碱农作物品种适应盐碱地”这个双向发力的综合施治原则，是保障我国农业用地全要素，特别是保证粮食安全的根本路径。

2020-2022年农业农村部在西北灌溉区、滨海地区和松嫩平原西部等盐碱地集中分布区，指导8个省份开展了盐碱化治理试点项目，3年累计实施面积240万亩次。经过3年试点，54个试点县均探索形成1-3套适合本区域的综合治理技术模式，累计形成200多个集中连片的示范区，惠及约17万农户和1600个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项目区耕地质量平均提升0.11-0.51个等级，土地含盐量平均降低0.2%。每公斤土壤有机质含量提高0.5g/kg以上，农业生产条件得到有效改善。

国家把农业良种研发列入农业发展的重要议程。我国农业良种科研机构 and 科研人员经过长期的努力特别是在主要粮食等食品作物良种筛选、试验、选育、培育开发上取得积极进展。尤其是对水稻、小麦、大豆、马铃薯等农作物耐盐碱品种选育推广上取得显著成绩。对水稻，农业农村部设立了国家耐盐碱水稻品种试验，2020-2022年国家审定耐盐碱品种11个，可在轻、中度盐碱地淡水灌溉种植。对小麦，2019年开始，国家设立耐盐碱小麦品种试验，2022年，国家首次审定4个耐盐碱小麦品种。

四、预防耕地土壤盐碱化一个重要的基础条件，就是大力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国家对此高度重视。2013年，国务院批复实施《全国高标准农田建设总体规划》。2021年，国务院批复实施新一轮《全国高标准农田建设总体规划（2021-2030年）》，由于各地持续推进，截至2022年底，全国已经建成高标准农田10亿亩，极大地提高了农田灌排能力。2023年，全国持续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力度。今年全国将新建高标准农田4500万亩，改造提升原有的3500万亩的保障程度，为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

为加快建设现代化农业强国创造更有利条件。

五、农业耕地中的盐碱地问题，具有复杂性、长期性、反复性、艰巨性。以现代农业科技为核心，以工程技术措施和现代基因编辑技术为手段，依靠现代农业技术，把物理、化学、生物等各项技术措施科学组合，实行预防与治理相结合，改造盐碱地和选育耐盐碱优良品种相结合，特别是发挥我国农业科研机构和科研人员积极性，在习近平新时代实现乡村振兴和建设现代化农业强国中，盐碱地在保证国家粮食安全中定能发挥出巨大潜能。

（作者：经济日报高级编辑。）

专家对 5 本书稿的反馈意见

《通讯》编辑部

为庆祝新中国成立 75 周年，先后编印了《通讯历史》、《编著目录》、《改革文选》、《活动纪事》上下两册，共 5 本文稿，分两次用电子版，送给有关专家审阅提出宝贵意见，不胜感激！现将反馈回来的文字摘编如下：

刘济民（国务院原副秘书长）：

1、《通讯》的成功是个奇迹！《通讯》是个宝库，是中华农村文化宝库！老郭是支撑这个农村文化宝库的最强大的柱石！

2、老郭，发来的改革文稿、文稿目录等收到了，非常感谢！

赵树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山东大学教授、《中国农政》主编）：

史料珍贵！

崔传义（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1、我从头到尾拜读了，这是郭老为中国三农创建的平台，联合各方仁人，汇集智慧策略，互学互鉴，为国为民，几十年求真务实，与时俱进，其功甚伟，载入中国农业农村改革发展、现代化转型史册！成事靠大家，郭老是第一人。向您学习、致敬。希望通讯在郭老三农精神感召下继续办好！

2、谢谢老郭，辉煌成就，我收藏起来拜读。

靳端生（中国农业大学原副校长、教授，曾任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政协副主席，致公党中央委员、北京市主委）：

太好了，全国还是第一份比较完整的农改史料！

张天柱（中国农大教授、富通公司董事长）：

郭司长您好，文件收到，非常震撼，如此庞大的素材和资料汇总收集，更不要说逐字逐句呕心沥血亲笔书写。这是您留给我们国家宝贵财富。值得我们学习，也是我们的一生榜样。

金继运（中国农科院土肥所原所长、教授）：

1、郭司长好！谢谢您的分享！我一直以来都知道您是一位有学问、有见解、有担当、有才华的专

家型领导，也知道您是一位勤奋多产的学者。但是看到您自 1996 年到 2024 年，仅在在《通讯》上就有 493 篇大作刊出！让我惊讶之余，产生无尽的钦佩和敬仰！一位年过九旬的老人，对党对国家三农，有如此浓烈的爱和深厚的感情！用您的笔，持续耕耘！实在难得！郭司长，谢谢您！也祝您健康长寿！为国家为三农献计献策，做出更大的贡献！

2、谢谢郭司长的惠赠！郭司长是我人生历程中有幸结识的长辈、学者、领导和忘年之好。郭司长的博学多才、爱国敬业、无私奉献、忘我工作、认真严谨、平易近人等特质和品德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使我受益终生。所赠编著都是无价之宝，我将安排时间细细阅读学习。今天只认真看过了郭司长的 2023 年活动纪实 153 项，为您在受包括新冠在内的各种疾病干扰情况下努力参与如此多的重要活动深感震惊和钦佩！但是身体健康是第一重要的！还请郭司长多多保重！以保持很好的健康状态，为国家为三农更多的献计献策！

李光英（原农业农村部政策体改法规司办公室主任、农药检定所原书记）：

郭主任，这两天您稳定了吧？不着急出院，听医生的安排。大致看了看《通讯》的历史文稿，感觉您退休以后仍在为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献计献策，说得上是呕心沥血了。这种精神永远值得我学习。同时也要感谢您编辑的同志，从一定意义上说这份历史文稿把您退休后的生活作了一个很好的总结，值得我们收藏。

王 娜（农业农村部法规司综合处处长）：

一早拜读老领导发来的通讯内容，老领导一辈子兢兢业业，为三农思、为三农行，我辈之榜样。

张红宇（农业农村部农村经营管理司原司长、农村经济发展研究院副院长）：

谢谢郭主任，我认真学习。刚才一直在给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给学员上课，没有看手机，迟复见谅！

王 晖（农业农村部人事司副所长）：

收藏梳理历史，本也是研究，认真拜读学习了。同时祝您安康！

李 娜（农业农村部政策改革司综合处处长）：

郭司，向您致敬，认真学习。

刘燕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处长）：

郭司长，收到您的大作，会好好拜读的。谢谢，谢谢您！

汪 阳（海南菌草研究院院长）：

敬爱的老师。听说您住院了，心里万分焦急。不能前去守护。多么遗憾。我让全体伙伴们虔诚地为您祈福！请老师静心休养治疗。等好一些，我请您到群里来听听大家的喜讯。又有几位副院长拿到了国

际大奖了！大家沿着您指引的方向不断努力为农业，为人类生态安全做着贡献。老师您是我们的楷模。永远向我们的明誉院长，尊敬的郭司长学习！

谢 安（清华大学人文社会学院教授）：

收到，郭老。我会好好拜读！多谢！多保重！

高 鸽（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办公室主任）：

郭老师您好！今天收到了您寄来的书，《通讯》历史很好，其他慢慢学习。您多保重。

张立英（农业农村部离退休干部局副局长）：

1、郭老收到，马上转发陶局长和政策处王立巍处长！您笔耕不辍，是活到老学到老的典范，特别佩服您。

2、郭老终身好学，笔耕不辍。

3、郭老好！周昕处长已把您的杰作给我了，一把手魏琦局长准备建个阅览室，把您的书已给综合处，将来放到阅览室，供全局人员学习参考！谢谢您！您是活到老学到老，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祝您健康幸福，夏安！张立英

周 昕（农业农村部离退休干部局东大桥处长）：

收到，认真学习。

郭书兰（1964年毕业于复旦大历史系，在社科院文献中心任副研究员，已退休）

这两本“三农日记”大珍贵啦，80万字，不易啊，是你的心血，是对农民、对人民、对国家的重要贡献！

当年轻人决定去种地

颜 旭 祁倩倩

屏幕内外，时空之间，“十个勤天”和返乡新农人彼此交叉、融会，让人们看到了农业的希望与未来，“谁来种地”这个问题也有了呼之欲出的答案。

后陡门的一场大雨，让地里成了烂泥汤，本来打算种小麦的赵小童等人犯了难，他跟几个伙伴合计了一下，决定先疏通排水沟。但几个年轻人都是种地的新手，而且其中一块地积水浅，面积大而分散，用不了抽水泵，用铲子铲泥又十分费力。陈少熙干脆跳到了沟里，“肉身通沟”，用双手和双脚把沟里的淤泥一点点地往外扒拉。经过整整一天的折腾，排水沟终于通了，几个年轻人抱在一起兴奋地又跳又叫，“经过今天，我们就是过命的交情了”。

这一幕发生在综艺《种地吧》，这档劳作纪实真人秀，由于真实地记录了十个不出名的年轻人（组合名为“十个勤天”）在200多天的时间里播种、灌溉、施肥与收获的种地全过程，吸引了许多年轻人观看。90后平东林就是其中之一，几年前决定辞职回老家安徽天长种地的他，在看到通沟这一幕时，觉得心脏被戳了一下，想起了自己也在地里做过同样的事。唯一的区别大概在于，这样的事情对“十个勤天”来说只是他们漫长人生的一个小插曲，而于他而言，就是他的日常生活。

“十个勤天”在节目里认认真真地种地，养鸡，种玫瑰……将一粒粒种子变成了麦田，把一个个鸡窝亲手搭建起来，让一片片荒芜开出花朵。摄影机将这一切都记录下来，人们在观看、触动的同时，殊不知，在更加广阔的现实舞台，这样的农事劳动无时无刻不在上演。“十个勤天”和像平东林一样千千万万的返乡新农人，彼此互为镜像，相互映衬，连接起他们的不仅仅是那块小小的屏幕，更是土地的魅力和劳动的快乐。无独有偶，“十个勤天”从种地门外汉到老把式的成长经历，也暗合了平东林们的命运轨迹。屏幕内外，时空之间，他们彼此交叉、融会，让人们看到了农业的希望与未来，“谁来种地”这个问题也有了呼之欲出的答案。

赌一把

诸事不顺。投了好几份简历都石沉大海，赵小童不知道自己除了继续投还能做什么。中央戏剧学院毕业的他，同级成名的已经有好几位。他不奢望名气，只希望能有机会去试镜、进组、拍戏，登上更多的话剧舞台。而2022年夏天毕业后，由于新冠疫情，原本要巡演的话剧搁置了，生活陷入停滞，每个月的开支甚至还要靠父母补贴。

无奈之下，他只能一边在咖啡店兼职打工，一边寻觅机会。在遇到《种地吧》之前，赵小童在关于就业的选择题上，从来没有种地这一选项，但看到节目的报名信息，他觉得这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即的好机会”：或许能对以后的作品创作和人物塑造有所助益，或许将是人生中不可多得的新体验。于是，“体验派”赵小童想赌一把。但他向来“不打无准备之仗”，在确定入选节目后，离开拍还有一个半月，

他报了与农业相关的网课，恶补农业理论知识，还考取了一个农艺师证，作为开启自己这200多天人生“副本”的原始装备。

赵小童眼中这“难得的机会”当时并不被社会所看好，《种地吧》节目的第一波流量是在综艺《吐槽大会》上被脱口秀演员庞博调侃，“所有人当个笑话看，没人会觉得这些‘手无缚鸡之力’的‘爱豆’们真的会在土地上完完整整待够6个月。”导演杨长岭开玩笑说，“第一季安装的围栏，就是怕他们受不了苦跑掉”。后来庞博做客《种地吧》说，“我以为这个节目最多只是一个PPT（演示文稿）了。”

“我们只想找到一个好的题材，找到最合适的人，然后我们所有人一起共创，努力做出一档好的节目，这可能是我们的追求和目的。”制片人吴寒说。不是循规蹈矩的乡村慢综艺，也不是刻意设限的田野闯关记，光靠这10位少年和“老天爷”，事情成不成有很大的风险，但杨长岭还是决定赌一把，“我们的任务就是督促他们，鼓励他们勇敢干自己想干的事儿。”

平东林一开始也没想着干农业，毕竟祖辈都是种地的，他觉得“没什么新鲜的”，自己也不是学农的。更何况，他在老家有一份体面的大学老师的工作，家人也很满意，“终于跳出农门了”，“有铁饭碗了”。但干了一段时间，他产生了厌倦，一个问号在心中升起：“我这辈子就是要为家人活吗？”

一番挣扎后，他决心去更大的世界看看。他瞒着家人辞了职，毕竟“给他们长脸的事我都干完了”。他去菲律宾读了个硕士，2017年底回到国内之后，竟有种“洞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的感觉：干农业已经不用“面朝黄土背朝天”了。植保无人机的兴起让他觉得很新鲜，“既能打药又能施肥，动动手指一块地就搞完了。”他觉得这是个风口，决心再赌一把，去搞农业。跟几个曾经的学生聊了下想法，大家虽然都没干过，但都觉得很好玩。或许是为了测试大家的决心，也或是为了推大家一把，平东林让他们把原本的工作辞掉，“既然大家想干，就得把后路断掉。不能觉得这个干不好的话，反正还能回去上班。”大家都很爽快，事情出奇地顺利，从平东林提出想法，到大家辞完职，再到成立安徽省天长市禾禾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只用了一个半月的时间。

当头一棒

让杨长岭没想到的是，《种地吧》开局就是“地狱”模式。2022年11月20日，是10个少年种地的第一天，他们要在月底前完成“双抢”：收割水稻，完成小麦播种。但那年浙江的雨雪天格外多，农田里积水积得不成样子，人走在里边都很艰难，机器更是无法下地，连富有经验的老农民都发愁的情况，让这些初涉农事的“新兵小白”给碰上了。

但是农时是不能耽误的，村长叶顺虎给他们联系来了收割机。赵小童作为主力驾驶，在第二次给麦田收边时，想多做点活好赶进度，却不想由于机器噪音太大，听不清外面老师傅指挥，导致收割机陷入泥地，上坡时还撞坏了零件。充满了挫败感的他，还第一次与老师傅发生了正面冲突。他去找师傅问解决办法，人家也生气不理他。

到了晚上，赵小童又试了几次，拖机仍无法将收割机拉出，反而越陷越深。“作孽哦！都跟你说了不要往这边来，‘死’都不听！”面对师傅的指责，赵小童默不作声，骤紧眉头，不知所措地左右张望，想不到解决办法，也不敢停下，只能默默回家拿了把镰刀，选择人工割稻追赶进度。“犟”“要面子”“真倔”……第一期刚播，赵小童就被骂上了热搜，观众们甚至“断定”这群少年就是种不好地。然而却很少有人注意到，那晚割稻时远处突然燃起烟花，赵小童举起手机拍了下来，“今天的意外之喜，是在今天快要结束的时候，来了非常绚丽的烟花，治愈了我们一天的疲惫。”他努力对自己说，“很开心。”

屏幕外的平东林也被上了一课。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那股劲头过去之后，生活的本质裸露出来，考验和困难接踵而来，日子开始变得难捱。

“一开始我真的想得特别简单，平时就打打药，闲的时候卖卖、修修无人机，不是挺好的吗？”哪怕从小就看着父辈种地，哪怕头顶硕士学位，哪怕用的是高科技，初涉农业的平东林还是碰了一鼻子灰。土地似乎要教给他们一个道理：空想不行，也别想着投机取巧，要脚踏实地地付出，才会得到回报。

“比如一开始我们给人打药用的是二代机，飞行的时候不能避障，到了地里也不会拐弯，要靠人用对讲机喊话‘到头了’。”本想着用了高科技，人就省力了，结果还是不行。2018年的7月到9月，平东林他们就没歇过，飞了2万多亩，每个人都晒得黢黑，“黑到原本认识我们的人都不认识了。”

操作的时候，老百姓总会问，“这草叫什么名啊？”“这是什么病害啊？”问得平东林心里直打鼓，“说不知道吧，怕农民瞧不起。随便说一个吧，又怕说错了被农民笑话。没办法，只好事后恶补。”

而且一开始，当地的农民都不相信他们，觉得年轻人嘛，不过是觉得新鲜，回来玩玩，干两天就干不下去了。或者就是想回来赚点快钱，赚到了就走了。好不容易拉来了业务，但平东林提供的服务无法满足人家多样的需求。“现在种好了，能不能帮我们收了啊？”“明年的插秧也很头疼，能不能帮我们吧育秧也搞一搞啊？”“收好的粮食我们不知道卖给谁，你们能不能来收啊？”

平东林不敢回答。

适应与熟悉

在《种地吧》第一季中，陈少熙和鹭卓、卓沅一起组成种植组，在搭建玫瑰花大棚时，安置骨架的标准杆需要放在画好的线外边打洞，当被告知“白打了”，需要从头打一遍时，陈少熙说：“人生不就是白干加白干嘛。”而后，熬夜安好立杆，好不容易固定完横杠后，大棚工人发现横杆两边不一样齐，需要整条返工，陈少熙崩溃大喊：“又白干了。”

到了第二季，陈少熙对鱼塘有了更清晰的规划，但“白干”定律似乎仍然延续，甚至出现了做节目以来“第一次想放弃的念头”。过年前，陈少熙和赵一博搭建好了鱼塘的一部分网箱，当时陈少熙觉得“妥了”，但年后回来，鱼塘却给陈少熙来了个“致命一击”，“整个桥要50米，我们才搭了6米，到后面就无法固定，搭不了了。”专业的师傅过来看，也判断说是从一开始就搭错了。这也就意味着，整个网箱要全部拆掉，重新再做。

那时候，大家都在大棚里忙活着种生菜、种玫瑰，陈少熙不知道找谁帮忙，无助的他一个人站在搭建的半截“桥”上，把浮桶按下去，“啪”被顶起来，按下去，又被顶起来，“一瞬间很想跳到河里，让自己清醒一下。”

到后来，赵一博从大棚里赶来帮忙，又请了专业师傅。网桥慢慢地开始搭建成型，当陈少熙转头看到一个初见雏形的桥时，他的“白干”文学书里，有了新的注脚。“先做，不要怕失败，一切都会好的，不管开头有多困难，就像我的网箱一样，它现在已经搭得很好了。”

对于陈少熙而言，第一季的“白干”，是毫无掺杂的真心话，没干过，想不通，后悔干。但是到了第二季，陈少熙习惯了“白干”，面对困难时情绪更加稳定，这句话就变成了兄弟们间的调侃。虽然白干了，但是还可以拾起来，重新干，是无聊的生活对你开的小玩笑。

就像“十个勤天”一样，时间长了，平东林也被逼得“久病成医”。不管是小麦蚜虫、小麦红蜘蛛，还是小麦赤霉病、白粉病，平东林不仅认得了，还能去预判预防。跟土地打交道久了，他还发现，土地

自有它的规律，要顺时而为，才能游刃有余。

而且被需求倒逼着，平东林的业务开始从飞防一步步扩展到育秧、插秧、旋耕、收割、收粮、烘干等环节。从社会化服务，再到整个的土地托管，逐渐形成了一体化运营。不仅能服务本地农户，还吸引了周边县市的同行跑来学习，来找他买秧苗。甚至还因为认可他的服务，主动给他拉来生意。“有个大户，今年给我们拉来了两个育秧订单，一家 1100 亩，一家 620 亩。”人家愿意来，无非就是因为省钱省力。平东林的育秧采用的是水稻精量播种线，一亩田能省种将近 1 斤，1100 亩地差不多能省掉 1100 斤的种子，一斤种子按照 25 块钱来算的话，能节省将近 3 万块钱。不仅如此，这种方法育出来的秧苗缓苗期短，能减少四天左右。根系很快就能开始吸收养分，茁壮成长。

完整的产业链条建立起来的同时，一条完整的回馈机制也随之形成：土地给予平东林的回报，他也将其回馈给更多需要帮助的人。他总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能帮一把是一把”。“我这里用的人工，大都是周边家庭条件不是很好的，残疾人也有。每天管饭，再加一天 200 块钱的工资，这样他们就不用出去打工了。”

就这样慢慢地，从一开始的一年育秧两三千亩，发展到如今的 1.4 万多亩。为了应对增加的田亩量，平东林又增加了一条育秧流水线，采购了 11 万张秧盘。这个增速和规模，平东林回头想想，自己都吓了自己一跳。最兴奋的还是收获的那一刻。就像去年迎来了大丰收，他的水稻亩均产量在 1400 斤，订单价能到一块五毛五一斤。“心里边真的是百感交集，想哭又想笑的，付出终于有回报了。”

升温的感情

干农业有时是个枯燥的营生。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一个人在地里从早忙到黑。而集体作战，给这个古老而又辛苦的行当，增添了一些并肩作战的同胞情谊。几个志同道合的年轻人，共同经历从无到有，那一座座共同建立起来的厂房，既是彼此友谊不断升温的证明，也标志着他们对农业的热情在层层累积。

快两年的相处，“十个勤天”之间俨然形成了一种默契，无条件对彼此报以最大的信任。第二季多个项目同步推进，每个人手里都有活，由于机器延误耽误了工期，赵小童的 3.6 万株韭菜和 6000 株叶菜必须要尽快栽种，工程量巨大。既怕麻烦兄弟们，又怕长不出来，赵小童那股拧劲儿又上来了，他闷声不吭，凌晨五点起来种苦苣。天亮后其他人来帮忙时，看着硬化过的土地，陈少熙问：“这能活吗？”何浩楠回：“不管能不能活，就陪他搞。”

鹭卓在第二季的节目中写了一首新歌，里面有句歌词：“即使想法再荒唐，有你陪我倔强。”“小童这件事让我想到了自己，我感觉我不是一个人，我有 9 个兄弟是一个家庭，兄弟们的爱让我有了支撑，让我做任何事情都无所畏惧，即使用一些可能不太聪明的办法，但最后总会有一个好的结果。”同样，陈少熙不认为种地以来遇到了什么“最大”的难题，“不管遇到什么困难，我们 10 个人在一起都可以解决。”更重要的是，在种地这一枯燥单调的农事活动里，非常需要陪伴，几个人一起干，快乐才有意义。

平东林的背后也有这样一个固若金汤的“兄弟团”。当初辞职设立合作社的 5 个人，到现在一个都没有少。“我觉得这就是对我们感情如何最好的回应。”这 5 年来，公司厂房从无到有，办公设施日益齐全，5 个人依然还肯团结在一起，干好一件事。“我经常跟他们开玩笑讲，我们第一个 5 年计划已经实现，我们再继续规划下一个 5 年，以及更多个 5 年。”平东林笑着说。

升级的农业

平东林还记得父亲当年种水稻的时候，一开始就是人工插秧，后来用上了手扶插秧机，但效率依然很低，一亩地需要4斤多的种子，而且经常缺苗，需要人工补苗。而他现在，不仅有了水稻精量播种线，还用上了一个暗化叠盘出苗技术：种子在暗化室里播下后，是在一个恒温恒湿的环境里，这样长出来的秧苗会更加健壮、整齐。不会因为待在室外，而受到天气、水源和鸟害的影响。

等到育好苗插秧的时候，插秧机里都装有辅助执行和北斗导航，机子正在哪里干活，干了多少亩，全都清清楚楚。刚准备干农业的时候，平东林还记得父亲当年干活的场景：戴着斗笠，挽着裤腿，一个人在地里弯好久的腰，也干不了多少。但是农业的发展在不断突破他的想象，而且是在他自己手里变成了现实。“在高标准农田上，我们的插秧机能实现无人驾驶了，从出库到在大田里面栽插，只需要一个在机器上喂秧的人就可以了。”

在种油菜上，一开始平东林总是遇上茬口问题，每次等到中晚稻收完，都到了11月份，再种油菜时总是会遇上寒流天气，苗要么被冻坏，要么又小又弱。如今他跟扬州大学的专家合作，用上了油菜毯状苗移栽技术：9月中下旬先在水稻秧盘里育苗，育好后再用插秧机移栽，成苗率就高多了。“去年过完年的时候，遇上两次强降雨和强冷空气，我们的油菜都没被冻死。”

虽然决定干农业之前没跟家里商量，平东林也能想到家人反对的理由，无非就是觉得这一行辛苦，没身份没地位。但他觉得自己赶上了好时候，“国家真的是鼓励年轻人干农业，有好多利好的政策。”起码在身份这一项上，他觉得跟自己当年在学校里上班没什么区别。“我当初研究生毕业回来，在学校里能直接评中级职称。但我干农业后，去年就评上高级农艺师了。”有了激励，他心里的劲头更足了，“我们踏踏实实地在地里干活，总会给人留下个年轻人不怕吃苦的印象吧。”

虽然自己不怕吃苦，但每次看《种地吧》开头几期，平东林都会心疼这素未谋面的10个弟弟，“太不容易了”。好在“弟弟们”也在成长。在节目第二季，他们的种植版图由142.8亩地变为422.8亩，又新增了一个10亩的玻璃温室大棚，一个30亩的人工湖，规模大大增加。杨长岭想在节目中增加更多走出去的内容，“我们还是想鼓励少年将视野放得更远，尝试更多科技农业和智慧农业。”在“勤天农场”里，水肥一体机自动化项目、水培蔬菜、立体草莓种植……少年们努力从生产技术、经营模式和产业品类等方面，尽可能展示现代农业的更多可能性。

谈到新农人身上应该有什么特质，赵小童觉得至少需要有新想法、新创意，在第二季的生菜销售环节，赵小童想到了把艺术和农业结合起来，选择新的品种，自己设计包装，展现每一种菜的特点，即便是在传统的菜市场场景下，他也尽可能施展创意的种子，用手绘牌子吸引住来来往往的人为之驻足。

“我们想过弄品牌，但是这样不太好，怕社会指责我们吃粉丝红利，产品被过分炒作。”他有这样的担心不无道理，每当看到“十个勤天”的农产品供不应求的时候，他们开心之余总能看到网上的批评，所以更想努力摘掉明星的光环，去摸索一些普通的“新农人”能干的事情，“让人记住是最重要的”他说。“其次，你得为消费者思考，为什么人家会愿意去买。”

经过冬天、春天，又来到了夏天麦收的季节。5月28日收割那天，夕阳的余晖把后陡门天空染成了金色，和金色的麦穗连成一片，洒落到每一个少年身上，仿佛是温柔地抚摸，嘉奖每一位认真对待土地的人。

赵小童脸上脏脏的，全是麦秸扬起来的灰尘，他站在收割机上，抹了下脸上的灰，看了看四周，觉得这像一幅画。他掏出手机，今天收麦的成果、远处还在工作的收割机，以及旁边说说笑笑的兄弟们，

都被他定格在了视频画面中。有句话跑到了嘴边，他写了下来：“眼含光芒，手种金黄。”

夕阳实在太美了，赵小童有些舍不得。直到兄弟们喊他了，他才起身离开，“但明天又是新的一天，不是吗？”

（作者：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来源：农民日报，2024年6月11日）

报：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工作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
送：有关部委司局、全国各省农委（农业农村厅）中国管科院机关及各研究所、中国食药促进会
发：中国食药促进会秘书处及各部门、农业经济技术研究所各处、室、中心及下设机构

总 顾 问：刘 坚 郭书田 毛振宾
副 主 编：谢久忠 辛 梅
邮 箱：zgynjs@163.com moagov@163.com
网 址：www.zhongguanyuan.com.cn
www.moagov.cn

地 址：农业农村部北办公区 16 号楼、18 号楼



主 编：胡兆荣
编 辑：孙正恩 石 卉
邮 编：100125 100810
电 话：010—59195293 66117652
010—66067899 66167899

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南 3 楼、4 楼

